

反正前途



MG
K825.67
9



反正前後

郭沫若著

上海現代書局印行



3 2168 4469 0

蒺 立端

一年以後從未接到過未知的朋友的來信了，
重要的原因自然是天上的太陽失掉了它的照耀我的自由。不過今天却是意外地接到了一封：

“沫若！”

“近來直譯式的文章太多了，你的幼年在我看來真是有意義的作品，在我，不知道你以為怎麼樣，我總覺得這種現身說法的作品是必要的。第一

作者寫的時候當然更會貼切一些，第二讀者讀的時候，他可以短刀直入的便認定了一個社會，而知道這不是‘小說’。有的人過於偏僻，好像以為文筆一敘到自己身邊上來，便不是我們陣營裏的文字，其實這是錯誤。材料什麼都可以，形式也什麼都可以，主要的是認識！主要的是要以我們的觀點來作一切的批判！關於這一層我覺得你是多少做到了，我接受了你這部新作也就是因為這樣的原故。

“你的目的是在記述中國社會由封建制度向資本制度的轉換，但這個轉換在你那幼年時代其實還未完成。這個轉換在反正前後才得到它的劃時期的表現，在歐戰前後又得到它的第二步的進展，餘波一直到現在，然而它的轉換終久還是沒有完成，而且運命上是永遠不能完成的。中國的資產階級要想完成它本身的革命，而他的同階級的帝國主義者却不肯允許。這是資本主義本身中的矛

盾，帝國主義者唯一的地盤是不能讓中國的幼稚的資產階級起來佔領的。所以中國的幼稚的資產階級永遠只能做帝國主義者的買辦，而中國便永遠肩戴着一個半殖民地的運命。這個運命果真是永遠的嗎？不然！解決這個永遠的詛咒的威力是無須乎細說的。中國總是飛躍，總是不能不飛躍，自五卅以來年年的事變不已經鑽石一樣地證明了這個事情。所以我想你想繼續寫下去的反正前後或歐戰前後乃至你最近的革命春秋，無非也就想敘述這些鑽石的事實。同志，你假如是這樣，我希望你迅速的寫下去罷！聽說你的“反正前後”將由某書局出版，我想這一定是‘幼年’的續篇，我正伸長頸子在等着，同時我還希望你把‘反正前後’以後的東西趕快繼續的發表出來。’

就這樣一封很簡單的信，但這裏面是含有怎樣猛烈的力量呢？特別是對於我的激發！我的這部

自敘傳的工作自從去年四五月間把幼年時代寫完之後便把它丟下了，丟了已經一年。我自己實在有點懷疑，我疑惑我這樣的文章對於社會上究竟有無效用。個人的吃飯當然是要附帶解決的問題，而在我們現在已經睜開了眼睛的人，一言一動都應該以社會的效用為前提，換句話說，便是對於理想社會實現上的政治的價值要佔一切價值的首位。假使白空地寫出一些無意識的文字出來，不僅文字是白無意義，連寫的本身也就是一項罪惡。這是使我躊躇的一個重大的原因，然我何幸在今天却意外地接到了這封未知同志的來信呢！

“材料什麼都可以，形式也什麼都可以，主要的是認識！”這真是怎樣透徹的一個見解呢！在寫者自身本不必是苦心思索得來的結果，然而在認識明瞭了的人他隨便的一言一語都說的這個真理，而這個真理也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於他的言語

之間，沒有半點的矜持，沒有用半句“直譯式”的文句。我也讀了不少的直譯式的文章，但沒有得到過他這樣一句話的力量。好的，我感謝你的激發，我也接受了你的勸告，我現在提起我全部的勇氣來繼續我這項工作了。總之我盡我的力量寫罷，當然我同時也要顧到：

“葡萄酒，你不要太濃，然而也不要
成爲一杯白水！”

這樣是我們現在所受的條件，也是我們的文字我們的言論所受的條件，我們的一句話總要透過一道迷宮然後才可以發出聲來，我們的一個字總要加上一層方解石然後才能射出光線；你看我們現在所處的是多麼可以謳歌的自由的時代喇！

我現在不知道寄信人住址，但我也無須知道寄信人的住址，所以我現在就把這部書來做我的回信。

好了，不再多說閑話了，下面便當轉入“反正前後”的正文。

郭 浩 年

反正前後

第一篇

第 一 篇

(1)

從前的人說：吳牛喘月，蜀犬吠日。這是說江南的平地多山少，因而太陽的光感沒有遮擋，所以江南的牛見着月光都要喘氣。四川的平地少山太多，因而見太陽的時候少，所以四川的狗看見太陽都要少見多怪的狂吠起來。其實這兩句話不過是文人的誇張罷了。

江南是誠然少山的，在春夏之交你假如在滬

甯車道或滬杭車道上，你從那車窗中，望見那眼前展放着的一片青翠的田畝就如像在海舟中瞻望巨海一樣，一直展開到遠遠的地平線上而隱沒下去。在這時太陽的光感倒不覺得有甚壓峻嚴，只是這眼前大好的平原真真是如像一片錦繡一樣可以讚美。在這時你會暫時忘機，覺得中國的前途是有無窮的希望葱翠着；在那田疇中工作着的農人，乃至在那圓草亭中拖着水龍的悠然拓大的水牛，真好像是世界的主人一樣。

四川的中央部其實也不外是這樣的光景。

四川是一個高原的盆地。北部西部我雖然不會去過，但從地圖上看來，從各道的水脈上看來，大約四面都是山，而中央是一個坦平的地面。這個坦平的地面究竟有怎樣的廣袤，在不曾去過四川的人是誰也想像不到的。

我自己是生長在峨眉山下的人，這是在四川

的南部。從我的家鄉走到嘉定城有一日的路程，已經是比較平坦的，並不是怎樣崎嶇的路程，嘉定城內外雖然有些丘陵，但離山岳的氣味便已經很遠了。由嘉定城再要到成都足足有三天半的路途，峨眉山的山影在我們的背後漸漸低遠下去，漸漸淺淡下去，走到了半途的眉山縣治便全部消滅在太空裏去了。由此以後的兩天路程一直走到成都，你向周圍四際遠望，無論在那一方你都會看不出有一些兒的山影！我們在這兒可以想像一下罷。大約就以成都為中心，以三四百里路的距離為半徑，向周圍畫出一個圓形來，四川的盆地大約就有這樣的光景。因為是這樣的盆地，而且是很膏腴的盆地，所以從古以來四川號稱為“天府雄區”。事實上中國的富源——專以農業來說——除江浙以外，便要說到四川。四川自從黃色大龍旗變成了五條顏色以來已經十七八年，時時包擁着一二十個大小

的軍閥，人人都有百幾十萬的大兵，年年都要鬧一兩次的內亂，然而四川的七千萬人民，至少是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農民，公然還是勉勉強強的在生活下去，你們想，那四川的富厚便可以知道了。

我對於四川得到了這樣的一個概念，那是庚戌年的正月我初次上成都的時候，用陽曆來說自然是1910年的二月了。我之所以得到成都不消說是要多謝嘉定府中學堂的把我斥退。我在嘉定讀書的時候，因為學校的腐敗，教職員的腐敗，自己的智識慾沒有方法可以滿足，只是一方面自暴自棄的朝墮落的徑路上走，一方面又只好就讀一些古代文學和小說傳奇一類的東西。但我當時想走的心事是怎樣的焦急呢！嘉定那樣的井底我是一刻也不想羈留的。能夠的時候是歐美，其次是日，其本次是京滬，更其次——這是最低的限度——

便是到成都了。從這些地方好像發散着有很強的磁力把我全身的血液裏面的鐵質都吸引了去的一樣。這只是一種不可遏抑的無名的憧憬。到這些地方應該學習甚麼，究竟有甚麼可以學習當時不消說完全沒有明確的意識。

景仰歐美，景仰日本，景仰京滬，景仰成都，就給五牛崩屍的一樣，少年的神經受着四方的牽引，他自然是沒有一刻鎮靜過的。然而我的父母是絕對不允許我走的，我受着那樣的磔刑，荏苒苒地在嘉定也就住了四年，突然遭了意外的斥退這是怎樣可以歡迎的事體呢！這回家裏人無論怎樣不能阻止我了，我至少可以得到成都去了！

學堂的斥退是在己酉年的十月，在斥退後不免還有一場小小的風波。

事情像那樣湊巧的實在沒有。上半天差不多

快要吃中飯的時候，學校掛了八個人的斥退牌，記了好幾十名的大過。在我們正把自己的行李搬出學堂門的時候，有一乘四轎坐進了中學堂的轅門，前面一個跟班捧着一個很長很大的硃紅紙的名片，我們起初以為怕是甚麼省視學或者委員來了，但看那四轎後面掛的一對燈籠一邊寫着“四川提學使委任”一邊寫着“嘉定中學監督嚴”。

——“這真奇怪了，嘉定中學會生出兩個監督來！”

然而事情並不奇怪，委實是一位新任的監督前來上任。這對於學校的辦事人們當然是晴天裏一個霹靂，而對於我們又是一陣霹靂後的一片晴光了。

新監督是一位洪雅縣的老舉人，他怎樣受了提學使的委任，那提學使又怎樣突頭突腦的撤了舊監督的差，這些情由我到現在也全不知道。看他

是一位鬚鬢斑白非人不暖的老先生，又看他那種走馬上任的神氣，他是一位全然不懂教育的外行乃至老腐敗，那是一眼可以知道的。但這對於舊的辦事人就好像是一種報復的一樣，所以我們對於這位老先生便表示了無上的歡迎。當天下午學生就派了代表去見他，請他立刻進堂主持，要他撤換一切壓制學生的舊的教職員，要他把我們斥退了的八個人通同召回，取消斥退牌，取消那幾十名的大過。嚴先生一一都承應了——其實他也是樂得做人情的，中國舊式的交替是一朝天子一朝臣，跟着嚴先生來的新教職員已經是很有不少了。但是嚴老先生說：他要到第三天才能接事，因為秦監督沒有準備，要到第三天上才能辦交代。

這幾天之中的學生，當然就給新的女蜂王出現，蜂子鬧分窩時一樣的鬧雜了，學校成了無政府的狀態，以前的教職員都不敢出頭，都知道自己

是要遭替換，便都向舊監督辭了職，就在我們被斥退的那天晚上都偷偷地把自己的行李由學校的後門搬出去了。剩下那位舊監督秦先生，他因為是責任者的關係不能不留在堂裏辦移交，那真把他可憐了。他一進一出要受學生的冷嘲熱罵，然而也不能忍不耐着裝聾賣啞。

學校是由舊式的考棚改成的，從前的大堂便改成禮堂，大堂前面的一條很長很寬的空場便改成操場，兩側又有扶手的欄杆。

在第三天移交辦妥了，秦先生的行李由禮堂後面送出。隨後秦先生孤影悄然地也從禮堂後面走了出來，嚴老先生在後面送他。

兩邊的欄杆上都站的是學生，看見兩位先生走下了禮堂，便一陣的鼓掌的聲音，一陣的萬歲的聲音，但這鼓掌聲和萬歲聲決不是對於甚麼人表示歡迎和歡送的喝采。可憐那位秦先生聽說是把

他的古銅色的面皮青一陣紫一陣的頭也不敢抬起來，眼也不敢側視。我想古人所謂絞腸的痛苦的他這時候是正在經驗着的罷？他的心臟最初一定興奮過一時，使他覺得全身發燒；但一回頭又緊宿得好像在斷氣一樣，使他覺得全身發冷，全身都在顫戰。他當然要痛恨那位嚴老舉人，在這時不一定是痛恨他奪倒了自己的飯碗，一定是痛恨他走路的官派走得過於委遲；然而他也一定要感謝的，在他踏完了那長的操場的最後一步的時候，他要感謝那操場幸好沒有再長。

不過秦先生的報復，他也早就預備好了。

秦先生前脚走了之後，學生便簇湧着嚴老舉人要他立即取消我們的斥退牌；他這次當然也無可推諉了。但他叫人檢查文案，才發現了一個絕望的事實。原來前任的監督早知道他自己一走，學生

一定要要求繼任者取消我們的斥退，他便一不做二不休，在斥退了我們的那天下午，也就是新任監督突然走來接事的那天的下午，他把我們斥退了的八個人通同稟告出去了！這在新任者和在堂的學生是一個絕望的打擊，對於我們被斥退者尤其是一個絕望的打擊。在當時斥退了學生，掛了斥退牌還要下通稟，這簡直是一條絕路。學生從此便不能用自己的本名，甚至從此便不能在本省讀書了，假如那提學使更給予全省的學校下了通飭的時候。秦先生這個報復手段真是狠毒。他不惟斷送了好幾位學生的前途，而且還斷送一位同學的生命。

那位帶了重傷的同學，是洪雅縣的人，他的姓名我忘記了。他平常是很用功，很守本分的人，他有一個很有趣味的自修課程，便是每天要讀英文字典，至少要讀二十個字來暗記。像他這樣用死工的

人我實在是少有看見的。他那天真是冤枉，學生們在和糧子鬧事的時候，他無辜的受了重傷，打得當場便在吐血。那昧盡天良的辦事人，就以這爲他鬧事在場的證據把他斥退了。天生的拘謹的人遭了斥退，已經是使傷上加傷，但幸好他們同縣的新監督來，以爲有法挽回，所以他也就暫得安慰了，誰料得斥退了他的人，還把他稟上去了呢？這個消息一傳到他的耳裏，可憐他的內傷大裂，竟至開倉的大吐起來。他始終的愛說一句英文：“You See, I am killed! You See, I am killed!”除此以外並沒一句話好說，他同時不消說已是失掉了他的本性了。

這位同學就在開倉大吐後的第二天，死在了他回洪雅縣去的肩輿裏面。

當時辦學的人對待學生大概就是這個樣子，他們就好像是在管理死囚。這個往事，回憶起來真不免有點令人痛心。

不過我自己是應該感謝的。他斥退了我固然好，就要下我的通飭，那也更好。因為我不惟可以到成都，或者說不定還可以出省，這是怎樣的一種幸運呢！

(2)

我往成都是五哥和我同路，我們先到嘉定城落在王畏巖先生的家裏。王先生在我進了中學之後，他曾經在省城的分設中學做過兩年的國文教員，他是才卸了職回來的。他便爲我寫了幾封介紹信給分設中學的他的舊同事。

在王先生家裏耽擱了一天，第二天便動身了，我們雇的是長途轎子。在當時的輿夫大概一個人一天只要一吊錢的光景，每天平均大概要走一百里路。第一天宿青神，第二天中午時分便到達眉

山，這兒是蘇氏父子的故鄉了。地名雖然號稱“眉山”，其實隔峨眉山已經有兩三天的路程，峨眉山已剩得一些兒若隱若現的影子了。在這兒有一座三蘇祠，但是關於他們，特別是蘇東坡的遺跡，倒不如嘉定還要多些。大抵眉山就在嘉定和成都的中央，從這兒以上風氣便漸漸的覺感着不同了。最顯着地令人感覺着變異的是自眉山以上有一種很原始的交通機關名叫“雞公車”。這是一種獨輪車，車夫在後面推送的，和上海一帶的小車子很相像，但比這更小，更矮，而且是只坐一個人的。車梘上縛着一張小小的竹椅，人就坐在上面正對着前面。這種雞公車多得非常，有時候一來一往在路上連成着一條很長的直線，嗶呀嗶呀的聲音是非常聒耳的。這種雞公車在眉山以南是沒有踪影的，在眉山以北便一直使用到成都。這種簡單的交通機關的使用，正足以證明成都附近就和江南地方一樣

是一望坦平了。

雞公車雖然很簡單，但他是破壞道路的健將。自眉山以上的南大路便被這些原始的車輪縱橫都挖出轍跡。下雨的時候自然是滿路濡泥，天晴的時候又是崎嶇不平的。在這種道路上，有時遇着一個小小的石子，雞公便要跳起來，把它身上坐着的乘客彈落在地上。然而在這種雞公車上公然也有可以睡覺的人，你可以看見那顛巍巍地挺在空氣中的上半身，就給風中的竹尾一樣，只是東倒西歪，或者是前顛後簸。

第二天的站口是彭山，第三天的站口是雙流，這些都是縣治。它們有甚麼特色的地方，我現在可不記得了。

第四天假如你清早一早動身，走不上半天你便可以到達成都。你進成都的市面自然是由南門進城，但你在離城還有三四里路的地方你可以望

見道旁一叢很蔥鬱的林樹，那就是有名的“錦官城外柏森森”的武侯祠了。武侯祠的廟門是坐東向西的，門內庭園中參天的古柏，雖不必一定就是漢時之物，但有的總怕是有五六百歲的年齡。

我們初到成都的時候就在這廟門口息了一次肩，我們進裏面去瞻望了一下，裏面有荷池，有水榭，有亭台，有花圃，有無數名人或不名人的題詠，頂多要算是對聯，但是說來說去總不外是一些三分六出三顧兩表之類的文字，丞相的祠殿之外有昭烈帝的墳在祠的南苑，墳的附近更有三義祠。全體的建築是很巍峨的，碑銘也特別多，我不知道那是甚麼時候建的。這兒對於專治考古學的人我想來是一項很現成的資料，特別是那昭烈帝的墳，那假如發掘出來，總可以得一些甚麼古物足以解決歷史上的許多問題的罷。我想中國現在所有的遍地的古墓，就是孔二先生的墓，都應該發掘，使用

內藏的寶物重見天日。假使以爲古跡須保存，那問題非常簡單，發掘了之後依然給它一個墳堆，那自然是無損於舊觀的；然而發掘物對於文化上那是會有怎樣重要的貢獻呀！不過主要的是發掘物的研究要集中，要善於保存，要立在唯物史觀的觀點上去整理，去清算我們，中國的古代以來的社會的進展。這件事項的實現當然不是我們一天一日可以說到的了。

到了成都。我們住在一家嘉定人慣住的旅店裏面，張伯安已經比我們先到了兩天。這時候已經是正月尾間，各學堂都絡續在開課了。

我們進甚麼學校好呢？有沒有希望得進省城的學校呢？

我們小學校裏的杜紹裳先生，這時候在做提學使衙門的科長，不消說他便是我們的唯一的軍

師。他替我們考查了案件，知道我們是被稟告上去了，然而沒有下我們的通飭。這不消說是很有希望再進別的學校的。他勸告我們考中等工業，他說我們只要把名字一改，便甚麼都不成問題。他之所以這樣勸告自然不外是“實業救國”的一個口號。不過關於這層，我們五哥和其他的同鄉都不甚讚成，以為這樣是旁道。這旁道的意思是對正道而言，所謂正道要像從前的由秀才而舉人而進士而翰林一樣是要由小學而中學而高等而大學。我們——我和張伯安——也覺得自己心不甘：因為中等工業的招考資格是小學畢業程度，而我們是有中學兩年半的學歷的。我們都不大喜歡，杜先生他也不好勉強。結局我們還是先去找中學堂插班，假如這一條路絕了望，我們又再來投考中等工業。

我們便得了好幾封介紹書，大都是杜先生親自給我們或是他替我們斡旋的。照他的意見我們

須先得說明自己是被斥退了，才到省來插班的，這層或者是他要卸掉他教育行政者明知故犯的來介紹我們的責任，但同時我們也覺得這樣爽快些，免得後來進了學校之後發生甚麼問題。

我們第一次所找的便是在成都久負盛名的分說中學了。

這分說中學在南校場高等學堂的旁邊，本來是高等學堂的附屬中學，因為前任的校長劉士志先生不甘受這種附屬的名義，才改爲了“分設”，成了一種半獨立式的性質。因為是高等學堂的附屬學校，它的經費很充足，設備很完全（得以利用高等學堂的設備）；又加以劉士志的聲望，所以學校的聲望也就非常的盛大。

我們到省的時候劉士志已經到北京去了。他之到北京也就給我們由嘉定逼到省城一樣，是因為與當時的四川總督趙爾巽發生了衝突。事情的

詳細我不十分知道，好像是在年底省城開運動會的時候，在會場上和那總督部堂發生了甚麼意見。這樣能和總督部堂衝突的辦事人，當然也就給我們能和學校辦事人衝突的學生一樣，是很可以博得人讚獎的。這位劉士志他雖然待學生也很嚴烈，然而却很能得到學生的敬愛。可惜我們沒有受過他們的陶冶，也沒有接近過他的風采，在他去北京之後不久便在都門客死了。

我們去投考分設中學的時候，那時候的新任的監督姓都名字叫靜階。大約因為是他的姓氏很奇怪的原故罷，他在社會上有個綽號（並不是學生取的）叫作“都喇嘛”。他的面孔也有點異乎尋常，八字鬍鬚，棕黃色的面孔，額部很突出，帶着一頂平頂的便帽珊瑚的一紅結子，一切的動作都有幾分機械式，真個就好像是西藏的喇嘛和尚一樣。

我們拿着一些介紹書去謁見喇嘛先生。這位先生還很容易謁見，我們的謁見單由傳事房遞上去之後他立刻就傳見我們。還有一位國文教員的鄭先生，是王畏崖先生的同事，我們聽得他還在學堂裏，便把王先生的介紹信也交給傳事房傳進去了。

都先生接見了我們，他只把介紹信看了一遍，便問我們：

“你們帶筆墨來沒有？”

這一問真是來得突然。我們答應道：“沒有。”

他說：“唔？你們怎攪的呀？怎麼來考插班都不帶筆墨來呀？”

這愈見使我們詫異了。我們以為我們是斥退生，雖然有人寫介紹信來，但信的內容我們是看過的，信裏只是說“有無相當的班次准與插班”，怎麼這樣的容易，纔拿起信來就要叫我們受試驗呢？

‘我們沒有想出先生今天就准許我們受試驗。’

“唔，今天不受試驗，要等到幾時啦？同學們你們看不是都在上學了嗎？你們的光陰好拿來湊盪？”

正當他在這樣教訓着我們的時候，鄭先生也出來了，他問明了之後接見着我，問了些王畏崖先生的近狀。回頭他把王先生寫給他的介紹信轉遞了給都監督。都監督接到手裏看了。

“好的，鄭先生，你來得恰好。我就請你出一道國文題來試驗他們。”

“今天就試驗嗎？”

“是的，今天就試驗好了。”

“在甚麼地方好呢？講堂沒有空的呢。”

“就在這兒好了。唉，不要用甚麼空講堂。”

“好的，我去問曾先生（學堂的監學）說，請

他們備兩份卷子，我同時把題附在裏面好了。”

鄭先生說了便告辭着退進去了。

回頭都先生對我們說：“你們沒帶筆墨來，同學裏面你們有朋友好借的沒呢？”

我們說：“我們初來沒有甚麼朋友。”

“好的，那我就借給你們罷。不過你們不要辜負我的上好的筆墨啦。”

就這樣第一天我們就受了入學試驗，試驗只是一道國文題，是

“士先氣質而後文藝”（限二小時完卷）。

我和伯安兩人就在會客廳裏面的茶几上做起試卷來，他坐在左邊的一排，我坐在右邊的一排，也沒有甚麼人來監考。都先生的住房是就在會客廳的右手的，只有他時常來看看我們。學堂內部每次課堂的上堂下堂的搖鈴的聲音可以聽見。在有

一次大約是下堂鈴罷，有幾個比我們更小的學生在休息時間走到會客廳的簾外來的用着好奇的眼光，隔着簾子看望我們。起初是一兩個，但他們就給螞蟻子一樣，有一個看了進去好像報了信來，又來了十好幾個。他們有的笑着指着自己的眼睛，有的又扯着自己的毛瓣。這是在奚落我們的：因為伯安是獨眼，而我是因為患了那場沉重的傷寒病之後，脫完了的頭毛還沒有長齊。但等第二次上堂的鈴子一響，他們又一哄而散了。

文章大概也做了兩個鐘頭的樣子，彼此都做好了。都先生走出來接到了我們的卷子，他自己就閱起卷來。他約略看了一遍，還看了我們幾眼。

“唔，咳，你們還好，還好，你們可以進來，你們明天就可以進來。”

“我們來插那一班呢，先生？”

“哦，老實，這個我到還不十分清晰。你們等一

等，我去請曾先生來問一問。”

說着他把竹簾揭開，隔着天井便向着傳事房喊叫：

“傳房！你進去，請曾監學會老爺來。”

不一會曾先生出來了。都監督問他學校裏有怎樣的班次。曾先生說有甲乙丙丁四班，甲班是五年級，乙班是四年級，丙班是三年級，丁班是二年級。

“我看就插甲班好了，唉，文字做得都還通順。”這是都先生說的。

曾監學很有幾分遲疑的神氣。

“他們原來是有幾年的學歷的呢？”

“哦，老實，你們是只有兩年半的，是嗎？”

“是的，我們兩年半還沒有住完。”

曾先生說：“那嗎要插甲班，年次太差遠了。”

“插入乙班怎樣呢？”

曾先生依然有點遲疑：“我看丙班不最相當嗎？”

“唔，好的。不過……唉，好的，就插丙班罷。咳，你們今天下午來把學費繳了，把一切手續辦妥了，明天就可以搬進堂來。咳，不要在外邊久滯了！”

就這樣我們便插入了分設中學的丙班，這是怎樣的出人意外的容易，怎樣的自始至終就像在一場夢裏的一樣呢！一時由鄉僻地方初進省城來的學生，考的是省城數一數二的中學，而且自己還是有內傷的斥退生，自始至終都是懸心吊膽的怕不會收容，怕自己不合格，怕對不着一切寫介紹信的師長，然而這是怎樣出乎意外的容易，怎樣自始至終就像在一場夢一樣呢！這是都先生辦學外行，還是真的看中了我們的文學，還是幾封條子的力量呢？這些問題我現在當然找不出適當的解決，不

過在我們進了學堂之後才知道了有兩個事實。一個是嘉定府中學堂第二學期，因為吃了監學先生的一碟辣椒醬油便遭了斥的姓宿的同學，他本來是和我們同年級的，然而已早來插入了乙班。還有一個在小學校裏低我們三級的一位姓羅的同鄉，他在這兒住的是丁班了。我們時常在這樣想：假使那位曾先生，我們預先也託了甚麼人寫了一封介紹信的時候，或者我們的中學課程，怕提早了兩年畢業罷？

(3)

憧憬了多年的成都，憧憬了多年的成都學校，
終竟是如願相償了，然而結果是怎樣呢？

成都和嘉定依然是魯衛之政！——這是我進
學校不上兩個禮拜便得到了的一個幻滅的結論。
一樣是一些做官的教職員，一樣是一些騙文憑
的學生。爲我們講經學的一位鼎鼎大名的成都名
士只拿着一本左傳事緯照本宣科，國文是熬來熬
去的一部唐宋八大家文，歷史呢差不多就只是
一個歷代帝王的世系表和改元的年號表。這是國學

一方面的東西，嚴格說起來連我們嘉定中學的有些先生都還趕不上。關於新學一方面的呢？真是同樣的可憐！講理化數學的教員們連照本宣科的能力都沒有，講淺顯的教科書都讀不斷句。不過他對於學生很寬大，一切的問題他是不要學生演的，他自己不消說也樂得節省些精力。然而這樣的教員公然還是擔任好幾個學校的教課的紅教習，這樣的紅色到真是有點令人恐怖了。一位姓徐的英文教員是江浙人，大約是上海那一座教會學堂的出身；他一身的穿着真是時髦，甚麼海虎絨鉄絲緞，有好些是我們鄉下人自出世以來第一次才看見的東西。金絲眼鏡，一把抓的尖帽子（我們四川人當時叫作京帽），嘴裏也含有好幾個金牙。他是不住在學校裏的，一來一往都是坐的四人抬的弓桿大轎；因為他當時在做提學使衙門的英文科的科長。然而這位科長大人的英文程度究竟怎麼樣呢？說

來恐怕有些人不大肯信，以為我是過甚其辭，然而始終是事實，連虛構也是不容易構出的事實。我們讀的是 Chamberlain 的二十世紀讀本，我記得是卷二，那開始一課是的一條 Newfoundland 的狗。我們那位英文科長，他竟不知道這 Newfoundland 是一個海島的名字，他竟拿出我們中國人的望文生義的本事出來，把它直譯成爲“新大陸”。只消這樣一點便可以夠了，我看可以不必再舉其他的例證了罷。

你想，一個頂重要的省會地方，而且是最高的學政機關的英文科長，他的英文程度才僅僅是這樣！在當時我們是非常悲憤的，我們當時的觀點雖然沒有明確的意識，可以說誰都是立在國家主義的立場上的：我們自然要痛恨中國爲甚麼要這樣的不長進，中國的所謂教育家所謂一切水面上的辦事人爲甚麼要欺騙國家誤人子弟了。當時我

們當然不知道爲甚麼會發生出這種現象的原因，即使要追求它的原因也只是在個人的良心或者是社會的道德上去尋求，所以不是歸之於社會的腐敗便是歸之於個人的昧良，更進一步便是說整個精神文明的墮落，要挽救它當然就只有革心的一條方法了。其實這些鬼話，說來說去的只是等於放屁！我們現在不消說是已經知道了，很明白的知道了。中國殭定了幾千年的封建社會在支配階級中發生了一個固定的公式，便是求學是爲做官。他們要支配封建社會中的單純的農民那是用不着多麼大的學識的，只消熬些資格便夠了。所以他們的所謂的學結果就是資格，所謂求學結果就是熬資格。海禁一開，資本主義一侵入到中國的內地以來，他整個的把中國化成了一個鄉村，化成了一個供給原料的鄉村。中國的支配階級看見自己的支配權日漸動搖，所以也想到採取一些資本制度下的利

器來鞏固自己的權威，然而在永遠是一個封建社會的鄉村中資本制度的所謂科學文明始終沒有根底來培植。外國人到中國來所施行的教育不消說只是在教育奴才，我們從外國請來的一些導師不消說都是些他本國不要只能到這半殖民地的海外來投機的妖怪，我們在這樣的條件之下，你怎麼能夠希望它有甚麼好的教育，有甚麼好的人才出現呢？中國開洋學已經好幾十年，然而一直到現在差不多連科學的科字都還說不上半邊。中國是只有飛躍的，有產階級的文明雖然無法產生，然而無產階級的文化的素質它已充分具備着了。

在成都振振有聲的中學校都是這樣的情形，其他的中學自然是不言可喻；說到成都全體的一種學界的空氣那更是在一種絕望的狀態之下。成都除分設中學，成都府中學，華陽縣中學等官立的中學之外有不少的私立的中學校。官立中學已經

是人情的世界，私立中學那用不着說簡直是四馬路上的野雞了。“學堂大打開，有錢的就請進來，”因而賣文憑的風氣便成了公然的祕密。在地方上連小學都只住得一兩年的人，只要把中學堂五年的學費繳足或者其它再繳納些甚麼手續費便可以立地得到一張中學畢業文憑。這樣的文憑在我們看來當然狗錢不值，然而它的效用却是非常的宏大。一個中學畢業生在當時好像是等於一名舉人，他有了這樣一張文憑可以拿回家去貼報條，誑惑鄉民，增長他新地主的候補資格。而在省他更可以飛揚，他有一張中學文憑可以投考本省的高等學堂，文官考試，法官考試，法政學堂，高等師範，更可以應考京滬各地的官公立學校，乃至東西洋留學生的考送。

在這種私立中學之外還有無數的私立法政，那更把中國人的投機的心理，做官熱，表示得更為

盡致。周圍只有二十二里路的一座成都城，在反正以前我們初到的時候，已經包含有十好幾座私立法政學校，在反正以後的頭一二年間，有一時竟陡增至四五十座之多。三月速成，六月速成，一年速成，當時的學界制造法政人材真是比花匠造花還要非常的腳快手快。因而父子同學祖孫同學的佳話便處處都有新聞。就那樣，中國說是也就變了法，也就在自強了，你可以向着鬼說：“鬼噯，你不要笑起尿來！”然而你想，鬼會怎樣答應你呢？

我們就在這樣的一種學校的陶冶之下，這樣的一種學界的霧圍氣裏面，你想，你怎麼能夠不失望，怎麼能夠不焦燥，怎麼能夠不憤懣，怎麼能夠不煩惱？最壞的是分設中學即隣比立高等學堂的旁邊，高等學堂在成都是最高的學府。然而那最高學府的最高學員，就我們所知道的，就有不少是買得私立中學的文憑而考入的。他年紀和你相若，學

問不管是怎麼，然而他總是你的“上司”。這對於年青人的自負心是怎樣大的一種打擊呢！

失望，焦燥，憤懣，煩惱，這幾條支流所匯合而成的自然是無為墮落自暴自棄的洪流。永遠沒有救導！在嘉定時是這樣，在成都時也還是這樣！我到成都不久又痛飲起酒來了。成都有名的大麪酒那真不知道醉壞了我腦袋子裏面的多少腦細胞了！啊，那大麪酒，那可怕的大麪酒！那怕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酒精。我記得有一次我把一杯大麪酒潑在桌上，用火柴把它接燃時，它燃到沒有痕跡，幾乎把桌面都燒了。大麪酒本是高粱煮的，香味非常的濃烈，但是吃起來，實在非常的辣口。我自己就我自己的經驗說，酒實在並不是好吃的東西。我自己吃酒並不是喜歡呢，實在是一種賭氣吃。自己心裏一肚皮的不高興，一肚皮的不滿足的時候，便想借酒來淘瀉。酒真可淘瀉這些憂鬱憤懣的

嗎？其實那有那麼一回事！李太白說：“抽刀斷水水更流，舉酒消愁愁更愁，”我看這倒是很有經驗的酒徒的告白。酒實在是只有增長愁人的憤懣的。平常，人的憂鬱是受着中樞神經一種制止機關的命令，不准它過渡表現的。這種機關愈高級，對於麻醉劑的抵抗力愈薄弱，所以它便先被麻醉。制止機關一受了麻醉，所以人在有一個期間便盡情把自己的憤懣憂鬱都發洩出來，有的暴躁，有的悲哭，便就是這樣的表現。到酒力把一切意識都完全消滅了之後，它也可以得到暫時的一段忘我的死靜，然而那酒醒後的報仇是怎樣苛烈！酒醒後的苦楚，那真是說不出來的苦楚，腦管痛，口管苦，人管無力，全身的筋肉都在不斷地抽蕩。那時候慘淡的心境就好像烈火過後的一座火燒場一樣。這到底有甚麼樂趣呢？這種情景在酒前早是自覺着的，然而依然要麻醉，依然要來自尋苦惱。我可以說飲酒的

人實在並不是享樂他頂多是想把精神的苦痛替換成肉體上的苦痛，更換一句話說，他是想自殺而已。貧窮人吃酒的我想來也不外是這種心理，自然有的因為天寒無衣要借酒來抵禦的，這雖是別樣的要求，然而同樣的悲劇。

吃酒自然要朋友，然而我們是新入生，舊的一些學生和我們總是格格不相容納。我的舊友張伯安自然可以時常陪伴我，但是他比我沉着得多，他有他所喜歡的數學，他能夠在那一方面自求滿足。但是我呢？我是對於數學不知道從幾時便有點畏難，然而對於文學却差不多含有一種無條件的輕視。那時候一般的口號是“實業救國”，所以凡是有志救國的人——那沒有誠意的志向也不要緊，縱橫救國是很美的名稱——總不得不傾向實業，要傾向實業便不能不注重數學或科學，而對於所謂文學便加以輕視。應該注重的數學有點畏難，而應

該輕視的文學不知道怎的却像一個私倡一樣總愛牽引自己。單是這樣一層的自然自艾，在有意識或無意識間自己不知道苦了多少，我想和我同時代的人，有相信一定是同受過這樣的苦楚的。伯安有他的數學可以嗜好，所以有時我羨慕他，有時我更微微有點惱恨他的沉着。

和我們同時考插班的另外還有兩個人，兩位都是都監督的同鄉。一位姓羅，和我們同考入丙班的。他的學歷很有曲折，他是到過日本的人，在日本成城學校好像住過幾天，因為鬧取締風潮的時候他便跟着一批中國的志士回到中國，起初在上海住中國公學住了兩年，他最近才回到四川的。他的年紀略略長我一兩歲，因為到過東洋的關係自然是一種短髮。這個人我很增進了我的失望，然而他也有使我隱隱佩服他的地方。他使我失望的，是他是到過我所景仰的日本和上海的人，然而他

的不懂科學的程度比我還要厲害。我記得他有一部英文的邁爾通史，這怕是表示他出過洋或者到過上海的唯一裝飾品。的確是裝飾品，因為他放在他的書匣是從來沒有繙讀過的。這部書或者怕是我開始讀真正的“洋書”的第一部罷。他有這部書，我們又同自修室，我自然時常向他借來看，我每每不客氣地繙出的生字使用鉛筆注在那書上，他責備過我一次，很鄭重地用橡膠來擦了。不過我對於這位姓羅的同學也很隱隱的佩服他，我佩服他有那種不自欺的勇氣，到過東洋到過上海之外，公然還有雄心再進本省的中學！中國當時出洋留學或者在上海留學的人，誰個不是學得幾句“瓦搭西”、“阿拿搭”，或者是“那麼溫”，“阿爾來”的幾句洋涇幫的“剝落坑”，不是就可以回到地方上去稱孤道寡的嗎？不忙說到十幾年前的當時，不忙說到那鄉僻的邊陲省份，就是在我們目前，在我們目前

的上海，不是儘有跳到美國的旅館裏去鬼混了兩三年，一回國來便是甚麼博士碩士由自他的稱許着巍然泰然便做起甚麼機關的委員，甚麼大學的教授，甚麼印書館的編輯嗎？商務印書館的編輯聽說是有定價的，留美學生是兩百，日本帝大畢業生是一百五，其他的學校是一百，朋友們，你們會做生意的，還是多花點錢到美國。

總之，這位姓羅的要算是我在成都新得的朋友。

還有一位是姓李的，這位先生真是徹底！他是因為家庭的悲劇使他陷入於自暴自棄的境地的。他插的是丁班，雖然和我們不同班，但因為我們同是插班生的關係，我們是同在一個自修室，也同在一個寢室。他也是彭縣的人，但家是住在成都，所以他是我們的一位很好的鄉導。他真是懶得有點徹底，他清早是死不起床的，點名的時候：監學向

床上來拉他，也把他拉不動，而監學也把他沒可奈何。這自然是因為他是監督的同鄉，而且好像還有甚麼親誼，所以監學先生們對於他須得有別外的一番關照；然而重要的原因還是他是死了心的人。他是並沒有向學的心，自然他也並不怕你甚麼斥退，唉，他並不僅是不怕，而且還由衷的歡迎。他的章法是：“你要斥退就請斥退罷，正合孤家之願也！”像這樣死了心的人，你無論怎樣的嚴刑峻法你都是把他沒有辦法。不怕你就鋸下他的頭，你就挖出他的心，你就把他用硫酸來燒死，你就把他身上的肉用刺刀一片一片的割下來凌遲碎剝，任你就用盡了你所能想到的新式的革命的刑罰，你都是把他沒有辦法。革命家的死了心，也就有這樣的神情。死是他所歡迎的，所以你不能夠把死的威脅來屈服他。不過革命家的信念自然和李同學的信念大有不同。革命家的信念是“非革命不足以救濟

社會”，而李同學的是“就把書讀好也會被晚母毒死”。無論怎樣的信念只怕你死了心，在死心踏地的面前，一切支配者的權威都失掉了他的生命。

這位李同學的這種特殊的性格和他的境遇，自然很引起了我們的深厚的同情。他不久便成爲了我們的絕好的朋友。

(4)

這幾位同學便就是我的酒友，此外也還有些在別的學校的我們嘉定的同鄉。我們只要逢着星期便是喝酒。落雨的時候自然是在城裏，天晴的時候我們大概是到城外各處的名勝地方。

成都城外本很有不少的名勝足以供我們遊玩的地方。東門外的望江樓是很有名的，那在濯錦江的對岸，臨着江邊。那兒有不少的幽曲的建築招攬遊人，最負盛名的是有一眼薛濤井。薛濤是唐朝韋皋鎮蜀的時候一位有名的校書，她能詩能文，手造

了因她而名的“薛濤箋”，傳說她製薛濤箋的時候便是用的那薛濤井的井水。井水誠然是很清冽的，井畔有茶店，便汲取井水來煮茶以供享遊客。舊式的雅人自然是時常到這井邊來喝茶的。井的附近乃至望江樓的區域裏面隨處都是有嵌壁的題詠的，可是我連一個字也不記得。竟連望江樓的區域內部的結構我都全然不記得了，那好像是一座寺院的附屬物，寺名好像是雷音寺，好像那有名的校書薛濤在後來就是在這兒落髮做了女冠子的。

我一切的以往的記憶都很模糊，但是有一個記憶，特別是與望江樓有關係的，却很鮮明地留存着。

那是成都辦花會的時候。每年三月成都城外的青羊宮和草堂寺是要辦花會的。這種措辦並不甚古，是在“變法自強”以後所產生出來的花樣，是一種博覽會的性質。會期大概有兩個月的光景。

草堂寺本來就是以有杜工部的草堂而得名的地方，那在成都城外的西南角上，由南門出城與由西門出城，大概是恰好在相等的距離。由南門出城，約略是沿着浣花溪的北岸西走，途中要經過浣花潭，青羊宮，和其他私人的別莊，最後是到達很清幽深邃的草堂寺。這條路徑，平常除鄉裏的農人，寺院的僧侶，或極少數極少數偶爾要去尋幽訪勝的墨客騷人之外，是很少人來往的。然而到了花會的時候，那真是要成的肩摩踵接的人的洪流了。最好你從南校場的城牆上去俯瞰——先附帶着說一句，成都的城牆是很宏大的，坦平的城牆上可以品排着跑三四部汽車，別處都在鬧拆城牆，我看成都的城牆至少是古人替我們築好了的環城汽車道，最好是在城牆上多開些寬大的洞口，我想來於城內的交通怕不會有多大的妨礙的。

你最好是站在那城牆上面去俯瞰。你看那直

接沿着城下的有馬車道一來一往的都是很新式的馬車。

浣花溪裏面平常是從不見有舟楫的痕跡的，不知道幾時從浙江的西湖裏面搬去了好幾十隻的白布篷的平底湖船，在那兒很匆忙的往送，使浣花溪自己也睜着了驚異的眼光。

溪的此岸是人道，溪的彼岸是馬道。你看那人道上的行人影。那有老的，少的，男的，女的，由城裏去的，由鄉下來的，喝醉了的，唱歌的，嬉笑的。過了一行成羣結隊的女學生，你看，必定有一行成羣結隊的男學生跟着。平常的兩腳除三合土以外從不粘地皮的人，現在也都和地上的青草接近了。這可以說是人羣的大解放，中國好像年青了三千年的一樣。

彼岸的馬道是沿着一些淺山的，那兒雖只定一些很可憐被人虐待到已經不成形狀的“溜溜馬”

(所謂驛馬)，然而都好像才從西域來的天馬龍駒一否，都好像西伯利亞或高加索斯的高頭健步的洋馬一樣。不消說真正的洋馬，時而也可以看見由鳳凰山的新軍騎着從那兒走過。像在那樣的時候，那會看不出是馬，會看成麒麟了。

我們在不是禮拜的時候，每天下午四五點鐘是可以出到南校場來遊戲的，我們便愛在那城牆上去看熱鬧。但一到禮拜，那我們便要成為那人道上的人或者馬道上的人了。馬車那時我們是不敢坐的，自己覺得還沒有那樣的資格，換一句話說，就是還沒有那樣多的錢。

就在辦花會時候的一個禮拜，我們上半年在花會場上遊玩了半天，下半年我們再決議騎馬去遊望江樓。我們——羅李兩位同學，伯安和我，此外還有些同縣人——騎了將近十條馬，由南門進城，向着東門方面穿城而過。

馬是溜溜馬。這種可憐的馬匹可以說是把它馬的性格完全磨滅掉了的。馬不消說大抵是很老很瘦。它對於人類的虐待也有種種消極的方法來抵抗。它走路是異常迂緩的，你打它幾鞭它跑快得五六步，然而又迂緩下去了。假使它前面有一匹馬的時候，它便緊緊接着前面的屁股，夫子一步一趨地任你打死它，它都不肯走前。這是溜溜馬的差不多唯一的特性。這種特性我可以說是馬的 Sabotage（怠工）。但假如你是不會騎馬的人，那它也很有揶揄你的手段。它突然跑得很快，把你扔下背來，它便一溜煙地跑了。再不然你騎在它的身上，它橫着便要把身子倒下去在地面上打滾，這時候不消說你的腳是很危險的。最俏皮的是它向一條狹窄的田埂走去，站着不動，兩邊都是有水的田，讓你下了它的鞍背，也還要弄得你兩腳的爛泥。

我們騎着馬由南門穿過東門。我騎的是一匹黑馬，這位先生比較還壯健，它從小資產階級零落成無產階級的溜溜馬大約還不甚久，我騎着它便打頭陣。它自然也不肯十分走快，但在城裏不走快也正合我們的要求：因為城裏人太多，走快了把人踏了，反不是好玩的事。荏荏苒苒的走出了東門，在我們的意思一出了城門便很想馳騁它們一下了。出城之後是還有一段很長的附廓的街道的，不幸就在出城之後走不幾步，便遇着兩位兵仗牽着兩條軍馬在街上慢慢的走。我的馬照着它們溜溜馬工會的規則，走上去接着了軍馬的屁股，便同盟怠工起來，便死也不再走前，死也不再走快。這真是難乎爲情的一個光景。前面是兩匹正在散步的閑馬，而我們騎在馬上便跟着它們在街上散步，兩邊兩街的人是萬目瞻仰着的。

惱羞成怒的我們把恐怖的手段施行起來了。

我拚命把我手中從南門外折來的柳條鞭子在馬屁股上亂打，我的背後的伯安也幫助打我坐下的馬屁股。柳條鞭子打脫了皮，打斷成了幾節，然而馬先生的怠業依然沒法解決。

“這該死的馬亡八！這是非用最後的手段不行了！”

我把我的小刀子搜了出來。我僅僅把刀柄的頭子用勁的鑿了一下，啊，這可不得了！馬兒暴動起來了！它四脚四腿地跳躍起來，我死命的抓着了它的鬃毛。它大約懷恨着沒有把我扔得下背來，便更加暴怒地在街面狂奔起來，一直往前面衝，全街的人都驚惶了，只是往兩邊讓。我自己又是初學騎馬的，馬術不消說絲毫也不懂，僅死守着一句成語：便是“馬兒跑得兇，一把抓着鬃。”我的死守的程度倒不僅“一把”，簡直是兩把了。韁繩也拉不住了，我也不知道馬兒跑兇了的時候，制馬的韁繩是

怎樣拉法，我只是死死的兩手抓着馬的鬃毛。兩膝不消說是挾不牢的，兩個屁股，就給打連枷的一樣，一上一下一左一右地在木的馬鞍上亂打。自己一心怕滾下馬去，一心又怕那樣的奔馬踏傷了街上的行人，真真是弄得來有點魂不附體了。把繁盛的一段街面跑過，跑到了人行稀少的街尾，終竟把街道跑穿了。算好，沒有踏傷了甚麼，但它還一直在奔跑，好像一直要把我帶進地獄裏去。

馬自然知道我是不会騎馬的，它的目的——報仇的目的——自然是想把我扔下背來，然而它不知道是怎樣痛恨的是它頂上多生了那一頂的鬃毛的！我死死的拉着鬃毛不放，任隨屁股在馬鞍上打鉄，然而總拌不下地去。我的屁股自然打得很痛，但是馬背怕也是不十分舒服的。馬的計策突然轉變了。它自從暴動以來一直是筆直的往前奔跑，跑穿街道了，在道右有一座小神祠，祠的封火

磚牆與路向成爲直角。前手的牆畔有一條小徑，與大路的路向自然也成爲一個正整的直角。嚇，那馬先生真是出乎意外的聰明。它一直都是風馳電掣的跑了來，跑到這兒它真如電火一般的轉折一樣，突然正直角地向小路上轉了方向，方向一轉它便和石馬一樣死立着了。這樣一來依着慣性的法則，我無論怎樣是應該落下馬來的，但終賴它項上的鬃毛沒有扯脫，我便吊在它的鬃毛上。

這一場惡鬥把我這位騎馬的階級真是制服得魂飛魄散了。亞非利加有一種黑色白條紋花的斑馬名叫 Zebra，撒哈拉沙漠中的獅子在狩取這種斑馬的時候，它是一步跑在那斑馬背上，一口咬定了它的項脊。斑馬自然是死命的奔跑，跑到筋疲力盡的時候，倒在地上終竟成爲獅子的食物。我坐下的那匹黑馬，在它拚命狂崩的時候，我想來怕只有 Zebra 奔命時的迅速才可以比擬，然而可憐我

這位獅子，雖然始終沒有被扔下，但在它靜立着時我只好倒在地上僵臥了好一會，心臟好像要爆裂的一樣，周身的骨節好像解了體的一樣，屁股特別是痛得不能忍耐。

我們是要往望江樓的，然而我這一匹單人獨馬，却沿着濯錦江邊在河這一面奔跑，離隔河的江樓不消說已經很遠了。我同路的人，當其我的馬把街道跑穿了之後，他們在河的對岸是看明白了的，他們便有兩位掉轉頭來迎接我。在他們走來接着我的時候，我依然睡在神祠右側的田圃上沒動額，馬大約也很疲倦了，它也沒有再朝遠處走，只在近處吃草。

兩個人把我扶着，我才站立了起來。施行恐怖者的下落真是到了寸步難移的地步。他們沒法，只好一方面去雇了一乘小轎，把我送到了望江樓，而他們兩個人牽着三匹馬只好跟在我的轎子背

後。

在望江樓裏息了好一會，自己的精神才漸漸恢復了起來。大家在望江樓上吃酒。吃酒之間自然是滿口的國家大事，一肚皮的牢騷不平，我們痛罵起學校的腐敗，辦事人的腐敗，學界的腐敗。在我們沒有出過省的人自然又要說到自己對於京滬歐美的憧憬，這時候姓羅的同學便要說話了。

“噯，四處的老鴉班班黑，你任隨走到甚麼地方都是一樣。歐美我沒有去過，但是聽說到那邊去的人沒有一個學過一點正經學問。博士的文憑各國都是可以用錢買的，像美國更有這種滑頭的辦法，只要你出上若干錢他可以給你一張甚麼大學的博士或者碩士的文憑，然而這座甚麼大學結果只是一種幽靈大學，它根本是沒有的。中國人便拿着這種文憑拿回中國來騙錢，騙官做。日本我是到過的。日本鬼很窮，他只要你的錢。管你用功也好

不用功也好，一切私立大學不消說都可以販賣文憑。中國留學生在那邊只是吊吊下宿屋的下女的膀子，學幾句下賤的下女話罷了。本來是全無科學常識的狗屁不通的人，跑到下國去少則一二年，多則三五年便跑回來，你想，單是要把外國話學好都還說不上，怎麼會有好大的學問學回來呢？然而他們反正是留學生，反正是博士碩士，你把他怎麼樣？哼，京滬的學校！幾座奴才教育的教會學堂不用說了，甚麼國立或者公立的大中小的學校那一種不是騙鬼的地方？你想，教員只是那樣資料，學校那裏會有甚麼出色去行。學生是一些青年人，虛榮心很重的，真正有向學的志趣的人，一百人中找不出一個。我覺得最可笑的是上海中等學校的學生，他們的理想是教科書一切都要用原本，案子上擺着有一兩本原文的教科書便好像把滿清皇帝的江山都奪到了手的一樣。你想，連“National

Reader”卷二的甚麼“Dear me, Dear me! I am a little bee”的兒歌都讀不懂的人，那裏就會懂得甚“邁爾通史”，又是甚麼麥鏗季的物理呢？然而却大家都像中了魔的一樣要誇讀甚麼原書，這樣一來倒也好，學生樂得滿足了自己的虛榮心，教員也樂得遮醜。甚麼，他給你一用原文來解釋，天老爺明白，你曉得他講的是那一個星球上的話呢？所以照我看來，還是在本省本本分分地用本國繙譯或著述的教科書，還多少有點益處。”

結論不外是兩種，一種是滿清政府沒有認真改革的誠意，所以滿天下的辦事人都不肯認真。更進一步便是把中國弄好，那是非把清廷推倒不可了。還有一種是李同學的虛無主義。

“管他媽的，學校就認真也好不認真也好，中國就滅亡也好不滅亡也好，縱橫我老是看不見的，我幾時用砒霜被人毒死，誰個能夠保障呢？”

一面是興奮，一面又是消沉，然而結果同樣是年青人的悲歌慷慨。不過我始終忘不了是那位馬先生的暴動，它使我坐凳都很艱難，回城的時候依然是用轎子。

敵（5）

然而成都畢竟是四川的政治的乃至文化的中心，所有舊時代的勢力與新時代的影響都是集中在這兒的。

舊的政治勢力有總督部堂，藩台臬台鎮台滿將軍。在這些舊式的官職之外表示着新時代的影響的要算是提學使司，巡警道，鹽茶道之類的設置了。鳳凰山已經創辦了兩師新軍，總督衙門的旁邊有西式建築的督練公所，這些都是很鮮明的時代的表現。

當時做巡警道的是周孝懷，他是滿清末年的一位幹員，他在那不生不死的新舊官場中委實是巍然地露出了一頭角。他起初本是一位落魄的名士，在我們嘉定還賣過字的，後來不知怎樣便做到了巡警道，大約在這些地方也正足以表示他的大有幹才了。他的德政，四川人給了他五個字的刻薄的口碑，便是：“娼場廠唱寮。”

娼是官娼，他把成都的娼妓畫成了兩個區域，一處是劉玄德即位為漢中王的武担山，一處是好像東門附近的甚麼石子院（院名好像是這樣）。使娼妓成爲了一種公開的營業，政府從而抽取花捐的這種近代的辦法，在四川大約由他創始。

場是“勸業場”。他在成都的中央處修了一條半西式的二層樓的洋街，目的原想提倡新式的工商業，然而開辦的結果是一場都是洋貨。刻薄的成都人當然又有他刻薄的品評：便是周孝懷勸洋業，

發洋財。大約這種品評向周孝懷的耳朵裏也是傳達到了的，他自己手書的趙堯笙體的“勸業場”的勸字後來竟不能不改成“商”字以作敷衍了。——這本來是一件很小的笑話，但這兒正明顯地表示着中國資本主義的運命。中國的新興資產階級雖然醉心於新式的工商業而提倡有心，然而結果只成爲一種買辦式的營業。

廠是“製革廠”，這怕是他最成功了的一項事業罷。這是用牛皮來製造各種西式皮篋的犯人的工廠。所出的革製品在四川自然成爲最新式的流行的品物，據當時在日本留學的我們大哥的來信說，好像比日本的成品還要價廉物美：因爲日本的革製品都是紙做的。

唱是戲園。成都最首出的新式戲園，名叫“悅來茶園”的，是取的官商合辦的有限公司的制度。那兒在初是唱的川戲，所謂“改良川戲”，自行招集

了一批戲子來教練，很有些像日本的‘帝國劇場’。當時“改良川戲”的名目頗流行於一時，如像老名士的趙堯笙先生都有“改良活捉王魁”，“改良紅梅關”之類的劇本出現，沿用着四川獨有的高腔，把詞子改得異常的文雅。這要算是戲劇的資本制度化，本身雖不是生產的，而在剝削者一方面却很是生產的。

察便是“警察”。這不消說完全是採用的新式的辦法。這辦警察的費用多半就由前面的“娼場廠唱”得來，經費很充足，因而在表現上也很有成績。在漫無組織的社會當中，突然生出了這樣的監視機關，而創立的當時又取的是極端的嚴刑峻法的主義，這在一般的無產者不消說都是視以為眼中釘，而就是大中小的資產階級都因為未曾習慣的原故，也屢屢的感覺不便；例如學生和警察的衝突，新軍和警察的衝突，便是這種情實的表現了。

因而周孝懷也就成爲了衆矢之的，四川人差不多個個都把他恨入了骨髓，一說起“周禿子”（四川人給他的諱名），差不多是人人都想食其肉而寢其皮。他後來由巡警道調充了鹽茶道的原故也就是對於這種衆怒的緩衝政策了。

平心而論，這位周先生在當時——由封建社會轉移到資本制度的當時——倒不媿是一位不言而行的革命家，雖然他自己庸或沒有這樣的意識，而他所歸屬的當時的官場又是以拿辦革命家自豪的封建勢力的結團，但他所舉辦的事業可以說全部都是對於封建社會的破壞，對於封建社會的革命。他比他當時的職業的革命家，所謂“亂黨”，在使中國產業資本主義化的一個階段上，實在是做了一番實際的工作。自然這些都不能說是他一個人的功德，而同時他的事業僅能限於極消極的一部分的消費部門，且如像“勸業場”之不能不改爲“商

業場”一樣，多半是招來了一個滑稽的結果，這也不是他一個人的罪過。換一句話說，便是“成也是你蕭何，敗也是你蕭何”，而這位“蕭何”便是近代的資本帝國主義。近代的資本主義把幾千年來彌定了的中國的封建社會造翻了，它儘可以依照它自己的形式造成了一個近代的資本主義的國家，然而資本主義已經達到了最後階段的帝國主義，它不能不需要一個非資本主義的外圍來以維繫它的存在，因而便不能不把中國永遠遏抑在原料供給者與精製品消費者的鄉村狀態之下，半殖民地的狀態之下。中國的覺醒了的新興資產階級，任你怎樣的努力，怎樣的掙扎，總不外是一個沐猴而冠，總打不破這樣一條宿命的金剛罷。所以中國的宿命就是這樣：你假使不澈底的和帝國主義者對抗，那你便只好成爲一個不生不死的長久的鄉村。這個長久當然也並不是無窮永劫的永久，資本主義

早遲有一天要達到它的總崩潰的時候的，這是人類社會的進展上一個重大的問題，也是將來待解決的問題。

在當年的四川，除掉周孝懷的這些局部的事業之外，還有一件最普遍最徹底的資本主義化的表現，便是川漢鐵路公司的建立。以武漢為中心的京漢粵漢川漢的三大鐵路幹線的建築，可以說是中國自受資本主義化以來的新興階級的一個理想。京漢雖是借的外債算已經落成，粵漢也繼續在動工，四川就在癸卯甲辰之交要起來經營川漢鐵道了。完全採取的是有限公司的制度，但是股本的收集却是帶有政治勢力的強制性質。我記得好像是百元一大股，十元一小股，由各州縣的知事按着地租的多少攤派到各地方的鄉紳。在這兒可以說是地主階級的資本主義化，四川的大小地主都成

爲了鐵路公司的股東了。四川的人口本不少，而土地又是很豐饒的地方，鐵路的股本所蒐集到的約略在兩三千萬以上。有這樣的資本，雖不算十分雄厚，但怎樣也可以做出一項事業了。於是在成都設了一座總公司在宜昌設了一座分行，由公司的經費更在成都建設了一座鐵道學堂。這個架步好像很可以使那鄉僻的四川一躍而與歐美並駕驅齊的一樣。

川漢鐵路雖名說是川漢，但事實上在當時的四川人所計劃着的只是由成都到宜昌的一段。但這一段也就是很長大的工程，而且中間還要打通一條巫山山脈。在測量的當時，工程是分成了三個段落的，第一是由成都至重慶的成渝一段，其次是由重慶至萬縣的渝萬，又其次是由萬縣至宜昌的宜萬。在未動工的時候，股東間，否，乃是股東的代表間，起了很大的爭論，便是先修成渝後修宜萬，

還是先修宜萬後修成渝。兩者也各有它的利益，兩者也各有它的困難。

譬如先修成渝，那因為地面平坦，工事自然很容易進行。鐵路一容易成功自然使省內的交通增加無限的便宜，使省內的股東得到鐵路的觀感，於將來的募股上也可以增加無限的効力。但是修這段路有它的困難處便是材料運輸的艱難：因為建築上所必需的材料都不能不仰給於外來，而這外來材料便不能不專賴那峻險的川河來輸運。這個困難本來在主張這一說的人是有它的解決方法的，便是鐵路公司同時兼營川河的航業，購買些小輪船來使川河的航行蒸汽機關化。然而這項提議終竟招了失敗，終竟是提倡先修宜萬的人佔了勝利。

主張先修宜萬的人最重要的眼目便是避免了材料運輸的困難，而在修成渝上所可得到的各項

利益便不能不全盤犧牲了，而且這一段路要通過巫山，正是最難修的一條道路。這在主張先修的人反轉成爲了一種理由，以爲唯其難修，所以便應該先修。先修成了宜萬這一段使川河失掉了它的危險，而蜀道也失掉了它的困難。大約在這兒就像這樣含了幾分有挑發性的英雄色彩罷——甚麼？圖大事成大業者不可畏難苟安！就像這樣一種土豪式的英雄主義便決定了川漢鐵路的運命，兩三千萬的股本，一部分歸了耗費，一部分歸了私囊，一部分成了北方軍人的私鬥的軍費，於是便煙消雲散了的川漢鐵路的運命！

主張後一說的人多半是川東川北一部分的人，特別是當時在四川智識界中振振有聲的蒲殿俊羅綸一流人物。據反對他們的人說，他們主張先修宜萬是帶有鄉梓觀念的私見，因爲宜萬先修通，川東川北的人便先得到利益，這或者也怕是一種

理由罷。總之事實上是證明着主張先修宜萬的人是失敗了的，僅僅在宜昌城外修了十幾英里的鐵路在十幾年來的拋棄之中已經隨着所有一切的鐵材木材成爲了廢物，而川河的蒸汽化一小部分由四川本省人的手裏，一大部分是在帝國主義者的手裏，不僅逐步的早已實現到了重慶，而且實現到了嘉定了。

事實上最公平的法官，儘管你是怎樣煊赫一時的大英雄大豪傑轉瞬之間便已證明了你是天下的罪人，人類的罪人。

在當時反對先修宜萬，主張先修成渝最力的是一位工程師名叫胡朝棟。他並不是四川人，可他是那一省的人我却忘記了。他以他專門家的資格，以他工程師的職責，做了一本“爲先修成渝鐵路告四川父老意見書”，這書我是讀過的是報紙十二開的書型大概有一兩百頁的光景。他以往去就力爭，結

果是他失敗了，同時他就辭去了他的位置。像這樣有人格有主見的胡先生，後來不知道怎樣在中國的土木工程界裏便再沒有看見過他的名字。是他早死了呢？還是有人格有點骨梗之氣的人在中國的社會終竟埋沒了呢？

(6)

二十前年四川的蒲殿俊羅綸的聲名差不多就像 Lenin, Trotzky 之於革命的蘇俄一樣，四川人差不多沒有一個人不曉得他們的。他們是癸卯年最後一科的舉人，特別是蒲殿俊，他是那一科的解元。這位先生在四川省外也比較有名，在民國十年代他是研究系的一位重要人物，做過一任北京反動政府的教育次長，也創辦過戲劇學校，在晨報副刊上還做過些白話文字。他要算是一位比較有才藝的時代兒，然而他的時代已經是過去了的時

代。

他們生在由封建社會轉移到資本制度的一個時代，成爲了那個時代的新興階級的代言人，特別是在四川，他們是當時新興勢力的領袖。他們的思想始終是不贊成劇烈的流血革命而想實現出歐美的立憲制度的所謂穩健派。他們和當時主張民族革命的一派“亂黨”自然是成爲對立的，用我們現在的話來說，他們這一派便是新興資產階級的陣營內的右翼。然而正因爲這樣的原故，他們一方面得到新興勢力的擁護，而同時也得到舊有的封建勢力的寬容，所以他們便得到了他們的榮達的機會。

滿清末年在宣統那位小兒皇帝即位之後在各省成立了咨議局，第二年又在北京成立了資政院，雖然是一種過渡時代的形式，總算是成了一個半立憲的國家。四川咨議局的正議長便是蒲殿俊，副

議長便是羅綸。他們也集合了一批同志，我所能記憶的有鄧孝可，有朱山。他們的言論機關便是月刊雜誌的“蜀報”。文字是當時風行一世的半解放的蘭墨式的文章，於六朝風味的美詞麗句之中，愛嵌以沉痛絕叫的狀語；大概不是一起便是“嗚呼”，總是一結便是“噫嘻”的。這種體裁在二十年後的今日還有多少保存着的，可以說是一二年前的“醒獅派”的文字了。這種文字在當時自然也不失為是帶着有一種革命性的。這就給放了足的中年婦人一樣，雖然不是天腳，總可以算是解放了的“半大小”。

文體儘管怎樣帶有挑發性，然而他們的內容總不外是一種君主立憲，更換一句話說，便是一方面承認着滿清的支配權，甚或認這種支配權的存在為神聖的必要，而在它的下面要求庶民的參政。要求國會的早開。這種言論在當時是很不能滿足我們的。在當時的中國的思想界是康梁的保皇立

憲和孫黃的排滿與漢的對立，在四川雖然只是片面的前一派入佔有勢力，然而在我們青年人的心目中却是儼然對立着的。中國的不富不強就只因爲滿清政府存在，只要把滿清政府一推翻了，中國便立地可以由第四等的弱國一躍而成爲世界上第一等的國家。這便是支配着當時青年腦中的最有勢力的中心思想。凡是主張這種思想的人，凡是這種思想的實行家，不消說是我們青年人所崇拜的對像。我們崇拜十九歲在上海入西牢而度死了的鄒容，我們崇拜徐錫麟秋瑾，我們崇拜溫生材，我們崇拜黃花崗的七十二烈士。一切生存着的當時有名的革命黨人不用說，就是不甚轟烈的馬君武，有一時聽說要到成都來主辦工業學校，那真是怎樣的成爲了我們一種無名的不可言狀的憧憬嘍！

我們並不是甚麼同盟會的會員，事實上當時同盟會的會員也好像並沒有好幾個，特別是我們

四川。我們時常在幻想，不知道怎樣我們總遇不着一位革命黨人，我們在我們那出過外洋或者到過京滬的教員先生裏面找，但始終沒有一個像。我們同年輩的同學連因為我們是插班生的關係都好像在把我們當成異民族在看待的一樣，不消說更說不上了。我們讀過一些俄國的燒炭黨人的小說，以為革命家的生活一定是很艱苦的，他是以殉教的精神在從事於救濟國家，救濟人類的事業，或者他們是為避免權力者的注意，為便於宣傳民衆起見，他們是間雜於卑賤的廝役之間。然而我們在我們所能接近的校役裏面找，依然和我們的教員先生相差不多。

分設中學的一些同學，那說是在有革命性的劉士志的陶冶之下教育出來的。後來在四川差不多成了革命黨人的元祖的楊庶堪也在那兒當過英文教員，在我們入學的頭一年年底才和劉士志

一道辭了職往北京去了。但那些同學却連絲毫的革命性也沒有，妙的是二十年後的國家主義派的健將差不多都出在那兒。那爲首的聖人曾琦，便是在我們丙班住過的人物。他比我們早一年來插班，在我們進去的時候，他剛好廢了學，所以我們可以說是先後同班的。他的綽號叫“曾補人”，這好像是成都的一種新方言，凡是滑稽的事物便稱爲“補人”，本義是從漢藥的溫補裏面取出來的。我在成都只和他會過一兩面，然而都沒有打過招呼。聽一些老學生說，說他除掉文章有根底之外，一切都很“補人”。他學了一年的英文連 a b c d 都記不得。他學體操是出左足擺左手，出右足擺右手，就給木製的機械一樣。關於這體育一項至少我是可以證明的，因爲後來我們有一個夏天同在日本洗過海水澡，他老先生諛實是連兩尺寬的溝都很艱跳過的。你想，像這樣的一位早熟的老先生公然

會以克來曼梭，麥索里尼自命，你說究竟補人不補人呢？先生之老我看是出自天成，他的年紀其實和我相上下，然而先生之氣之橫秋也，實足以上咸五而下尊三，自比克來曼梭，自比吾家國藩，或者還是他的客氣罷？

此外如王光祈魏嗣鑾李劫人周太玄諸人都是我們當時的同學，前三位尤其是我們丙班的同班。在當時都要算是同學中的佼佼者。太玄在諸人之中最年青，他低我們一班。他是翩翩濁世的一位佳公子，好像是生在我們的隣縣峨眉縣的人，他的父親在峨眉縣做過教官，他有一位胞兄也和我在嘉定府中學堂同過學的。他很是多材多藝。據我所知道的，他會做詩會填詞會彈七弦琴會畫畫，筆下也很能寫一手的好字。後來聽說他在法國是研究的古生物學，這是他的選擇異於尋常的地方，大約我們中國關於考古的一方面，將來正大大的有待

於他罷？他的兒女聽說也很多，生活聽說也很苦，而所學的又是歷史的科學，我想他將來或許有機會可以轉換到他應該轉換的方向罷？我想真正的聰明人只要覺悟了一個做人的應該走的路，他可以拋去一切的過去而煥然一新的。

舊的一些同學大概都是不大管事的人，特別是我們丙班。他們的不肯好事，或者有些是出於他們的天性，然而有多半也是出於聰明。大凡在學校裏愛管事的學生，到頭終竟是沒有好的結果的，能夠獲得這一點經驗的聰明，大抵的學生都是有夠的。我自嘉定中學遭了斥退，我這個愚蠢人也學得了一些聰明，進分設中學以後，自己是有意識地保守本分了。但誰料還有更比我聰明的人。我進學堂不久，學堂要對於劉士志先生開追悼會，劉先生和我是百不相干的人，追悼會也並不是甚麼危險的集會，我們丙班的同學公然舉了我做籌備員，這

真是出乎我的意外。而且從此以後我的丙班代表的資格，差不多成了終身大總統一樣，總是次次被選了。平常對於你儘管冷落，一遇有事的時候，總把你推選出來，這點厚意實在是一點也不敢領情。然而一被舉出了之後總還是要去擔任，或者也怕是我生來便賦有了的一種愚而好自用的宿命。

成都畢竟是四川的政治的乃至文化的中心，所以學生在鬧事的時候，它的性質也和地方上的大有不同。我在樂山小學遭了斥退，是因為鬧在禮拜六放假；在嘉定中學又遭了斥退，是因為在會館裏看戲學生和營防的鬥毆；都是一些百無聊賴的原因，說起來真是很可慚愧的事體。然而成都學生界鬧事的性質，就我所曾經參加過的看來，畢竟是大有不同了。

就在庚戌年的十月（陽曆的十一月），天津鬧

過一次國會請願，有三四千的羣衆向直隸總督請求代表。還有溫世霖諸人組織了一個國會請願同志會，計畫着以全國學校總罷課作爲要求的後盾。然而結果失敗了，清庭把溫世霖逮捕了，流沖到新彊。四川因爲相隔太遠，大凡外界的風潮總要相隔一月之後，然後才能波到。外邊的請願運動已經鎮壓下去，然而它的反響却在四川發生了出來。

時候已經在停課準備學年試驗的期中，風潮的發源地是四川最高學府的高等學堂，一通油印的通函要求各學校舉出代表來在教育總會開會。丙班的代表不消說又是我。

教育總會是在高等學堂的右手的，在午前十點鐘開會的一個長方形的議事廳，早被各學校的代表擁塞滿了，爲數怕有兩百人的光景。但因爲大家都沒有受過訓練，對於開會的方式，開會的程序都完全沒有把握。演壇上簇擁着許多的人，議論紛

紛的開始便討論怎樣開會。壇上的人壇下的人爭着說話，你插說幾句，我插說幾句，一直綿延到午後一二點鐘了，都還不能正式的宣佈開會。因而走來湊趣的人不免也就噴有繁言起來了。

“喂，今天到底開會不開會啲？”

“我們餓着肚子還沒吃中飯呢！”

“倒底是請願國會呢還是看你們爭風？”

就這樣你一句我一句的，本來是沒有秩序的一個會場更加麻亂起來。在這時學生間慣用的權命符，便是在地板上擦腳。

“好，開會了，開會了！”

發起的人幾個爭着叫，不知道那一個是會長，不知道那一個是主席。結局依然是把會場整頓不起來。連宣布開會都宣布了好幾次。

這種滑稽的現象，我想在初次從事運動的團體，大約隨處都是有的。在當時不要說是學生會，

就是堂堂的資政院或者咨議局都是時常要演一套全武行的。

但在混沌之中突然有一人登壇。這人的面貌很瘦削，大概有三十歲的光景，穿一件青布馬褂，帶一副鐵絲的近視眼鏡。他的穿着雖很樸素，但看他的風度却不像一位學生。

他在壇上幾次想發言，也終不能如意。演壇上有兩三個學生便同時大叫起來。

“這是劉子通先生，我們請聽劉先生說話！”

劉先生的名氣我老早就聽見過的，但在今天才第一次看見他。他是湖北人，在鐵道學堂裏面當教習。他在成都學生間很有聲望。就是他這聲望把一些無經驗無訓練的學生征服了，會場便立地靜鎮了下來。

但這劉先生是教習，為甚麼那天來參加了學生的集會，我不甚明白。是他有意來指導，或者是

有人特地去請他來的，我都不甚明白。總之有他的一登壇，會場靜鎮着了。

大家都在靜待着聽劉先生說話。

“同志諸君！”劉先生這樣先叫了一聲。“我們今天開會的目的是要請願早開國會，但不幸我們今天的這個會場便沒有請願國會的資格！”

他一起便是這樣的一句翻案文章，這樣的演說在羣衆中本來很帶危險性的：因為羣衆立地便可以哄動起來。但大約一方面是劉先生的聲望服人，一方面也是會場的情景着實令人難堪，所以大家都甘受了他的批判。還有他這樣的一句嚴烈的批判，很可注意的是實際上並不帶有嚴烈性。我現在過細的研究它的原由怕他所用人稱是“我們”而不是“你們”罷？他開口一聲便是“我們”，這樣他自己便忘記了他的教習的資格，他是和學生羣衆合成了一體，學生羣衆的錯誤他也把來加在

了自己的頭上的。就在這樣一字間的差別，可以看出一個人的教養，而且也可以判別一句話的力能。

劉先生的演說，結局是並沒有甚麼崇論宏議，他下了一句批判之後，只是說：“今天的會不是這樣開的。應該先推舉出一個臨時的主席，再來討論本會的進行，產生出本會的決議。在我看來，今天我們的話已經說了不少了，凡是到會的人對於今天的宗旨沒有不贊成，沒有多作討論的必要。我們最好是趕快產生決議來從事進行。我們應該進行的步驟，我看是第一步應該組織一個常務機關，第二步是舉代表去見咨議局長，請咨議局把這次的運動擴大起來，第三步是請四川總督代奏。此外如像通電京滬學界表示聲援，通函省內各學校各界共同起來參加，都是今天本會應該急於解決的事體。本會把大綱決定了，就移交給常務機關執行，

一刻也是不能容緩的。”

這樣簡單的幾句話，真好像是撥雲霧而見青天的一樣。贊成的聲浪在全場中沸騰了起來，有的竟高聲叫着：

“我們就舉劉先生做主席！”

“我們就舉劉先生做代表！”

“我們就舉劉先生做起草委員！”

大家在這時候也把劉先生的身分忘記了，忘記了他是鐵道學堂的教習。

劉先生的這一番指導在我們目前已經充分受過政治訓練的學生界看來，本來只是家常茶飯，並不是怎樣可以記述的事；但在當時的學生界而且在當時的四川，它的評價却是不能和今日同論的。那樣簡單的一種實地訓練給予了學生以多大的經驗，多大的秩序，多大的力量呢！至少是在我自己，

可以說是有生以來所接受的第一次的政治訓練。

會的後段便很順暢的進行起來了。由幾個高級的學校的代表組織了一個常務機關，分頭去進行各種事務。大抵的決議是：

1. 要求在明年便開設國會；
2. 要求四川總督代奏；
3. 一律罷課，不達到目的時誓不就學。

(7)

當時四川的總督是趙爾巽，他在滿清末年要算是一位有數的重臣。他是漢軍旗，便是他的祖先本是漢人而投降了滿人的。這種“奴才”對於他爲“主子”——當時的大官或一般的滿人都稱清室爲“主子”，稱自己爲“奴才”——自然是要表示兩倍的忠誠的了。

學生在第三天上又開第二次的代表大會。目的是報告常務委員會成立後的經過，及今後進行的方針。

開會仍在午前十點鐘，但在八九點鐘的時候早就有不少的武裝警察和營防軍，在步槍上上着刺刀，在教育總會的門前巡邏着了。

這對於學生是很大的威駭，同時也是一個很大的激刺。明哲保身的人預感到今天會發生甚麼危險，在報到簿上偷偷地簽了名，偷偷地又走了的自然有；然而到會的人依然是異常湧躍，到開會的時候，小小的一個議事廳又湧塞得像一匣火柴了。

受過了一次訓練的羣衆究竟不同，一切開會的景象都很井井有條，同是幾個人在那兒主持，但和前一次的開會判然是兩個時代。

開會了。劈頭的一個臨時動議是質問當局爲甚派兵來彈壓。當時的封疆天子雖不必身在九重，但那容你幾個毛桃子的學生便輕易見面，輕易質問？唯一的拐杖當然又只好去找咨議局的正副議長。

據代表回來的報告，他們去會着了蒲議長。蒲議長頓時打電話（當時已有電話，但只限於行政機關）去問警察廳，說是奉了趙制軍的命令，怕有亂黨借端生事特地派來保護的。說是蒲議長昨天已經去謁見了趙制軍，趙制軍已經允許了為我們代表奏。照趙的意思以為學生關心國事是出於愛國的志誠，固然可以嘉許；但不可越俎代庖，甚至罷課要挾。

我們的代表質問過議長，問趙答應為我們代表奏究竟有何誠意的表示？他口頭答應，而實際並不執行，我們有甚麼方法保障？我們請開國會即是求言論集會的自由，然在我們今天開會的會場上却派軍警來彈壓，豈不是完全表示了並無代奏的誠意？

蒲議長自然不能代答，他允許了為我們再去見趙制軍，一切的回話等得到結果之後再親自到

會場上來報告。在他未來之前，大家應該嚴守秩序，決不可輕舉妄動。

一省最高的言論代表者的議論大家自然是只有遵守的。在代表們報告完畢了之後，已經是午後一點鐘的光景，便宣告中休，大家吃用上準備好了的饅頭。饅頭，這真是再得機宜也沒有的，像前回爲餓飯訴苦的代表當然也就沒有了。

在學生們休會用饅頭的時候，到場的軍警差不多全部都把槍駕在教育總會門口，在附近的吃食店裏，各自去解決他們自己的切身的問題去了。現在想起來當時的支配階級的爪牙，真是有點超然物外的神味：假使當時學生要暴動，那不已經是送來了很完備的武器嗎？一切都是進化着的，便是支配階級殺人的手腕也是一樣。

有一個比較老一點的警察，大概已經有五十

多歲的光景，他還是在門外站崗沒有去吃飯。我看他人很和氣。他看見我們在吃饅頭好像很有點垂涎的樣子。

我問他：“老總，你肚子不餓嗎？爲甚麼不去吃飯？”

“不餓？你說我不餓？哼哼，老先生，吃飯要錢呢。”

“你們平時站崗不吃中飯的嗎？”

“平時是要換班的，今天是專差，署長叫我們沒有命令不准動。我們又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一大清早派到這兒來，又不派人來替代我們。”

“我好不好送兩個饅頭給你？”

“哼哼，”他只是笑。

這兒真是立地表現出了一個天國。究竟是饑餓的力量，饅頭的力量大，它立地便可以使獅子和嬰兒同遊，老虎和羔羊攜手。

“老先生，今天你們到底爲甚麼開會呀？”

“你們還不曉得嗎？我們是請願早開國會。”

“國會國會的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就是說讓我們一切的老百姓都要來管國家的大事，讓我們一切的老百姓都要來說話。”

“哦嚇！”他很驚駭了的一個神情，“怪不得我們的署長老爺說你們要造反啦！”

這個泛泛的插話，我現在回想起來真是很有趣味。我們在請願早開國會，而當時的支配階級說我們在造反，那位老巡警也承認我們在造反。我在當時不消說還替他解釋了一下，怎樣怎樣，如此這般的並不是造反，然而現在想起來我們當時不真正是在造反嗎？造反就是革命，現在想起來那對於封建社會的支配階級要求立憲，不就是革命的行動嗎？當時的所謂“革命”不消說是“滅滿興漢”，乃至是投炸彈拉手槍，甚至於有時我們要求立憲的

行動是保皇黨的行動；但現在由我們批判起來，兩者在社會的機轉上不正是同一的嗎？當時的革命黨人以爲滿清是一切罪惡的淵藪，當然也就是立憲的唯一的障礙，但這個見解在事實上已經證明了是沒有摩着實際。中國在滿清滅後已經二十年，不是一直都還不能立憲嗎？中國在帝國主義者的宰制之下，自己的這個資本制的革命，始終不能由中國的第三階級來完成。它無論怎樣是只有飛躍的，就是兩步要當成一步走。中國在不能脫掉帝國主義宰制的期間，它始終是在封建社會的最後一個階級上鬧軒輊戲的。

會場在繼續開會的時候，大概是兩點鐘過了。這時又來了一批新的巡警，他們走來把劉子通先生提去了，說是提學使司要請他說話。

劉先生在會中指使，當然一定有內探已經向

當局報告了的。大家阻擋着他，勸他不要去，但他終竟去了。他以為不會有甚麼意外，就有也用不着畏怯。

劉先生去了，但從此以後便渺如黃鶴，不僅那天他沒有再回會場，就在四川的學界上也永沒有他的形跡了。有人說是他是被送解回到了湖北，但以後在中國的活動上也就再沒有看見“劉子通”這個人物了。我想，他或許在四川便遭了暗算，或許是在武漢起義的時候，他已經陣亡了。

劉先生去後，羣衆事實上是失掉了它的領袖，他們等蒲議長的到來，而蒲議長却終不容易到來。時間遲緩得就和癩病患者的脚步一樣，只帶來着許多的焦燥，憤懣，恐怖，不安。直等到蒲議長的到來，已經是快要上燈的時候了。

我第一次得瞻仰蒲議長的風采的便在這個時候，其實他貌不驚人，我現在也想不出他有甚麼殊

異的特徵。不過他來的聲威真是浩大，大家一聽說他來，便都狂濤一樣拍起掌來了，拍掌的聲音差不多一直等到他登了台開口說話。

議長的聲音很尖銳，不過他的說話却還井井有條，我很感謝他的是他把當時要求立憲運動的歷史，敘述了一個梗概。

中國立憲運動的具體的表現大約是發軔於戊戌政變，但最可注意的是光緒三十二年，就是民國前六年，在上海靜安寺路成立的“豫備立憲公會”。這個公會我記得那江蘇的新興資本家張謇，便是主要人物。運動的起源是由英國資本家手裏爭回滬杭甬鐵路，在這爭路的工作告了一個段落之後，便一轉而為立憲運動。這正是第三階級革命的由經濟鬥爭轉到政治鬥爭的一個最規範的事實。將來假使有想編述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或者是中國資本家政治運動發展史的人，我覺得這個

事實應該站最重要的一篇。

就因為有這些代表的資產階級的提倡，所以一時才四方響應起來，在宣統元年（民國前三年）才有九年立憲的詔書，到宣統二年更由這些人鬥爭的結果又才有五年立憲的縮短。當時一般新興階級的要求是在宣統三年就要立憲，我們學生界的運動，自然就是承繼的他們的意識。

蒲議長不消說也是當時鬥爭中的健將，他是才從北京請願了回來，溫世霖的被捕，外邊運動的風潮已經鎮攝，他是知道的。四川學生界的運動，只是圈外的餘波，當然他也有甚麼不明白。所以他始終勸學生不要操切，他以為只要省當局答應了代表，儘他口頭也好實際也好，只好暫時以為滿足，靜待時機。而且他說，當局是有意拿人，假使運動尚要繼續，那就非出於流血不可了。

議長的舌鋒便突入革命與立憲的問題上來。

他說兩者的對立便在這兒。一種是以非法的手段爭奪政權，一種是以合法的主張要求立法。只有法是必由之路，只有依法才能生法造法。譬如要走入議事廳必然要由門逕，不能打破玻璃窗亂跳。

議長的話很有他的條理，學生方面終覺駁不倒他，然而總覺尋不到十分的滿足。自然這在老人們看來，或者會學生幼稚，學生的客氣未除，但僅僅這樣的批評終竟是難以使人心服的。譬如入門不跳窗眼的警語，那只是片面的事實，萬一有甚麼意外的災難突然逼來的時候，你就要不跳也不容許你不跳。這就是所謂突變的理論，這在當時不消說是沒有人明白地認識的，然而真理的影子總暗暗地含在人的腦中。

夜分已經深了。

蒲議長辯論了一番，勸解了一番，但沒有得到

一個決議的形式，他便走了；不過他的辯論他的勸解也好像收了很大的效果。在一部分的代表辯論正熱烈的時候，多數的人已經在絡繹的退場。剛才湧擠得像一匣火柴一樣的會場，真個又像一匣使用着的火柴一樣，一根二根的抽出，抽到後來怕沒有剩下三分之一的光景了。

人一少，會場的熱度自然也就會減退下來。同時幫助把問題暫時告了一個結束的不消說也有大家奔波了一天的疲勞和黑夜的女神隨身帶來的睡藥。大家最後的決議是：一律再繼續停課拒絕試驗，偵探劉子通先生的下落。

就這樣在一個不得要領的觀望的形勢之中也就只好宣告散會了。

在我們退出會場的時候人已很少，早來的軍警依然還在那兒站崗，有的在紛紛吐出怨言：

“媽的，今天不曉得見了甚麼鬼！”

今天沒有製造出一些鬼來，這些造鬼者當然有點不愉快。

(8)

在學生無法下馬的時候，當局者絆馬的方法已經準備周到了。

就在宣佈繼續罷課的那一天下午，提學使司有一道很嚴厲的通令下來，就是禁止學生借故生事，罷課要挾，假使有不聽命的，還要懲辦各學校辦事人。

這不消說對於學生運動是一個很大的打擊。

在起初開始運動的時候，因為運動的目標純全是一種愛國的表現，所以各學校的辦事人，無論

是怎樣頑固或內心是怎樣的惴惴焉恐懼怕犯所轄官長的逆鱗，然而在表面上總不能不取一種放任的態度。這回提學使司的命令下了，而且還要懲辦他們，這比甚麼早開國會自然還要更切己得幾百倍的問題；他們的態度自然便不能不有所藉口，由放任一變而為高壓了。

這對於運動的前途自然是很大的一個打擊，然而比這個打擊還要更大的，是學生自己臨到了不能繼續罷課的關頭。平常學生罷課除極少數是熱心運動之外，大多是趁趁熱鬧，樂得天天都是星期。所以重要的契機與其說是熱誠，寧肯說是偷惰。在這一次運動的開初宣告罷課的時候更處在一個很有便宜的時期，便是各學校都已經在準備試驗的停課期中，有的應該畢業的班次也因畢業試驗提前開始的結果，大都已經試驗完畢，只在等待文憑的分發了。

但不幸的是已經罷了課三天，試驗已過在眼前。在試驗未開始的期中，儘管名目是在罷課，然而大家是拚命在按着課本死讀的。別的学校，別的班次是怎樣我不十分知道，至少是我們丙班，從這兒後來出了不少的國家主義者的丙班，他們之所以舉我為代表的心事，我是十分明白的。就是說：讓你這個豬頭三去為我們撐門面，你沒有時間溫課，也好讓我們來高列。在當時科學才廢止不久，試驗的觀念在學生的心目中比自己的生命怕還要重要。好像自己來當學生，便是專為來受試驗的一樣。這逼到臨頭的試驗對於運動的進行比五百道的提學使司的命令恐怕還是頑強的阻礙了。

在這兒教職員與學生大眾的利害便是完全一致，少數學生代表便在虛空中倒懸起來，成為了兩種羣衆的公敵！

最不幸的是分設中學，試驗的開始就在罷課後的第四天。丙班的第一堂試驗是英文，從一大清早起來在自修室便在 but cut 的亂唸，大家都把鋼筆墨水準備得上好的，自然是充分的表現着有關受試驗的心意。

八點鐘了，已經搖了課堂鈴，英文教習的江先生已經上了課堂坐在黑板面前等着了。但是人的羞恥心畢竟還有它最後一番的控制，想受試驗的心事，想昇班的心事，儘管是怎樣迫切，然而賣團體的一種工賊式的行爲，誰也不願意來做一個魁首。在自修室裏面你觀望我，我觀望你的只是不動。監學走來勸告了。就給從案牢裏面來趕羊子的一樣，一個一個從自修室裏面拉出房門去，但等他前脚走進第二室裏拉夫的時候，第一室裏的人又一個一個的退回自修室裏去了。所謂“扶得東來西又倒”，甲乙丙丁四班人，弄得兩位監學疲於

奔命。

監學的勸誘不行，最後是監督走來了。

監督的都喇嘛先生照例是像麒麟一樣，把頸子向前面伸長着，一手理着他的八字鬚，一手驛在長統的袖子裏面，一拐一拐的擺着他的官派的脚步走來了。

“唔唔？你們為何不上課堂？唔唔？你們為何不上課？”

從甲班說到乙班，從乙班說到丙班，但僅僅是這樣一種催促要把羣衆的羞恥心克服是很不容易的。

喇嘛先生畢竟是老手，他看見整個的勸說是行，他使用切散的辦法，向軟弱的各部分來零碎的進攻。他第一步是去誘導乙班的十幾個的滿人。成都是有滿人駐防的；所以乙班裏面便有十幾個滿人。這十幾個滿人平常和我們漢人便不大接近，

他們自己另外成爲一個部落。他們的自修室和寢室都是聚在一處，我們平時也就稱他們的自修室或寢室爲“滿城”。他走進滿城去勸那些滿學生。

“噲？你們真蠢！你們也要罷甚麼課？你們要和你們的主子作對？”

他公然用民族的感情來歆動，那些蠢如豕鹿的滿學生公然也就被他歆動了，於是乎他們便先上講堂。

喇嘛先生得到了這一着的成功，他便更加添了一倍的力量，他放下了甲乙兩班比較年紀大的學生，又來專攻丙丁兩班。

“你看，你們爲何還不上課堂？乙班都已經上課堂了。”

大家仍然不動。他又檢着丙丁兩班的比較更年輕的小孩子來拖。

“噲，你們這些小孩子，你們爲何也要跟着他

們大孩子鬧？你們也要去參政嗎？嚇？你看，乙班都上課堂了。唔，你們真蠢！你們跟着他們大孩子鬧，你們是受了騙。唔，你們不知道嗎？像高等學堂，師範學堂，那些承頭的學生都是受了畢業試驗的。他們受了試驗，讓你們來罷課，你看你們蠢不蠢，唔？”

小的被他拉出來一個，但等他去拉第二個的時候前一個又跑進自修室裏去了，依然就給拾取地上的板栗投進沒有底子的提籃裏的一樣。

“都先生，我們不是滿人呢！”

“都先生，我們不好做漢姦呢！”

“管他是滿人也好，漢人也好，你們小孩子要參甚麼政？不怕人笑脫牙齒嗎？唔？”

然而結果總沒有辦法。

都先生又想出了一條妙計來了。他見一個二個的拉夫式的辦法不行，他便叫兩位監學把丙丁

兩班的學生全體都整列着在自修室的門外。自修室是一排北向的六間房舍，和丙丁兩班的講堂相隔僅一個天井。

他也並不是要來演說，從前的舊人對於演說這一套本事是不夠拿手的。他依然還是那種勸說的調門。

“好，我看，唔，你們是害羞，你們怕先走了，別人笑你們。好的，我來給你們叫口令，你們一齊走過這道天井。唔？唔？你們——用意！——”

大家都笑起來了，喇嘛先生得到這一笑，以為他的幽默收到了成功，他更提起了他那種半像京腔不像京腔的聲音，又來了一聲——用意！

“好不？我叫一二三，你們便一齊開步——走！好，來啊！一……二……三！一齊開步——

走！”

儘管像在跳猴戲的一樣，表示得異常滑稽，然而走還是沒人走。

像這樣低首下心的滑稽過後仍然發生不出效力，那必然的結果是惱羞成怒了。喇嘛先生把一個古銅色的面孔氣漲得成了一個鷄血銅的面盆一樣，八字的鬍子隨着他嘴唇的痙攣，就給去了磅的天秤，在一上一下的搖動。

“唔？唔？唔？你們……你們……你們要和我作對！你們這些糊塗虫！”

這樣暴怒着的喇嘛先生，在他的心裏依然是運用着策略的。他知道我是丙班的代表，他大約以為我真是一班之王，他使用下了擒賊擒王的手段。

“郭生！”他喚我，“你可以叫他們上課堂啦！”

“連監督都叫不動的，我怎麼有那樣的力量呢？”

“那嗎，你就先上課堂做一個榜樣！”

他這一道命令真是咄咄逼人。

“大家都爲愛國運動甘願犧牲自己的學業，我不能來做破壞運動的罪魁。”

他棱着眼睛看了幾眼，鬍子翹了幾翹，他憤憤地走上階沿，走向他的居室裏去了。但他剛好走進房裏又退了出來。

“張生！郭生！”他站在階沿上氣憤憤在招呼着張伯安和我。

“你們上來！”

我和張伯安服從了他的命令，沿着自修室前的北階走上他站立着的東廊上。那兒的地基比自修室的地基高可兩尺，隨着天井的廊邊是有一帶迴欄可以憑坐的。

我們走到了他的面前，他當着兩位監學和兩班的學生便痛責我們。

“啊，你兩個！你們真對不着我！你們在本地的

中學肇事遭了斥退，是我把你們收容了進來。啊，你們，啊，你們！我以為你們可以改過自新，啊，你們又才來和我作對，你們又在這兒來肇事，把一切很好的同學都帶壞了！你們到底上課堂不上課堂？不上課堂我要斥退你們！”

“都先生，”伯安也很憤氣的說，“士可殺而不可辱，你要斥退就請斥退。”

伯安我真不知道他走的是甚麼運命。從前嘉定中學堂的斥退是因為我連累了他，這回又是我把他連累了。喇嘛先生說要斥退我倒還有理可說，因為我當了代表，但是伯安是並沒有甚麼罪過的，他之不上課堂也就給全班的人不上課堂一樣，不是甚麼罪魁，也不是甚麼禍首。

好的，我們又算遭了一次斥退。要說是宿命，怕也只好說是宿命罷。我們當時便退到自修室裏收拾書籍。兩位監學在自修室外面對着丙丁兩班

的學生威脅起來了。

“好的，你們看！爲首的兩個人都斥退了，你們自己還想怎樣？你們假如也遭了斥退，看你們回去怎樣見你們的父兄？”

是的，對於羞恥心的壓迫得到了一個緩頰的口實了：爲首的都已斥退，我們還想怎樣呢？

就這樣連拉帶勸的把一羣半推半就的學生便勸上了講堂。

姓羅的一位同學，他和我們是同自修室的，他還算走得頂遲，在他和我們分別的時候他和我們一一拉了手，問明了我們住的旅館，他說他今晚上要來看我們。

那位懶得最徹底的姓李的同學（我真是對不着，我現在怎麼也記不起他的名字來）自始至終是陪伴着我們的，他看見一個二個人都上了課堂，他不知不覺的流出了眼淚來。

‘媽的一個口!’他很大的叫了一聲,“辦你媽的一個鬼學!老子也不願意讀書了!”

他在書桌上打了幾拳,憤憤的也就把他的書籍收拾了起來,跟着我們走進寢室。

在我們把一切行李從寢室裏搬出來,從東廊上走過的時候,大家都在講堂上埋頭受着試驗,真是寒蟬仗馬,悄然無聲,比起剛在四五十分前的光景,就好像隔了兩個世紀的光景。

走過都監督的居室的時候,聽他在室內明聲朗氣的在誦讀很高古的“號季子白盤”的銘文:

“……丕顯子白……庸武于戎工……經維四方……博伐猷狁于洛之陽……折首五百……執訊五十……是以先行……桓桓子白……獻馘於王……”

聲音繼續到我們走出了的學堂門外。

第二篇

第二篇

(1)

照陽曆說起來，在我們鬧國會請願的時候已經是一九一一年了。一九一一年！就在這一年，中華老大帝國的黃色大龍旗的商標就要改變，這有甚麼人曾經夢想到的呢？

滿清在他末年的時代因為外來的帝國資本主義的侵略，在這兒發生出了一個舊有的封建社會對資本主義的鬥爭。然自鴉片之戰而中東之戰而

庚子八國聯軍入京，舊有的封建勢力被外來的資本主義打得一敗塗地；自此便不能不授首請降，中國的封建勢力一直到現在便都成爲資本帝國主義的爪牙了。

資本主義的本身是一種傳染病，它到東方來，把東方固定了幾千年的金甌無缺的封建社會打得七零八碎的時候，但同時在中國的內部也播下了它的種子。這種子剛好就像過了時期的花草一樣，一播下去便蓬然地發生了出來；於是中國的封建勢力與資本主義的鬥爭便改換了形式：從前是與國外的資本主義的鬥爭，現在是與國內的資本主義的鬥爭了。在這兒中國的資本主義便成爲舊有的封建勢力與外來的帝國主義的共同的敵人。在這兒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手段是利用舊有的封建勢力，而舊有的封建勢力要維繫着它的支配權也不得不依賴帝國主義，自從庚子以來一直支持到

現在差不多是成爲了一種固定的方式。

所以中國的資本主義在它起初戰取它的位置的時候，它不能不遇着兩重的敵人，一方面要和國外的帝國主義抗爭，一方面又要和國內的封建勢力巷戰。大資本家張謇輩的滬杭甬鐵路的抗爭一轉而舉出國會請願立憲要求的烽火，不正明白地表示着這個徑路嗎？更明白的是這個方式的複寫而更加擴大的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這在我們看來並不是有多麼大的光輝的資產階級的革命，自民國成立以後是爲一小部分的人所壟斷了。革命的紀念爲武漢起義的十月十日所佔有，由資本主義所醞釀成的中華民國就好像是天上降下的神祇所創造的一樣。其實這完全是想以一手遮盡了當時的事實。真正的歷史家，他用公平的眼光看來，他會知道辛亥革命只是四川保路同志會的延長，中華民國的雙十節

怕至少應該改成雙九節罷。

滿清末年中國的封建勢力達到它的最後的專制的階段。因為要和國內新起的資產階級鬥爭不得不盡力的主張中央集權，把素來就和封建諸侯一樣的各個省份，各個省份的督撫的軍民財政之權都集收到了中央。在這兒更加上一種民族的感情，便是封建社會之中心勢力的滿人對於漢人的排滿，便極端的排漢。宣統小兒皇帝一卽位的時候，把一時炙手可熱的袁世凱譴貶，大大的起用滿人親貴，使漢人不得入掌軍機。對於革命黨人的屠殺，對於立憲運動的牽延敷衍，對於請願國會的重要人物的拿捕，變相的科舉制的復活（宣統二年曾恢復過一次留學生的科考），這些都是封建勢力的獨裁專擅，倒行逆施的表現，然而實質上就是封建勢力對於新興資產的階級鬥爭！

這個鬥爭最赤裸的是表現在盛宣懷的入掌郵

傳辭而施行他的鐵路國有的政策。

國有政策，在這政策的本身當是可以英屬的。它的最高尚的動機不消說是想加速度的促進中國資本主義的進展。因為中國商辦的資產事業都收到不良的效果：例如粵漢鐵路以四五千萬的資金僅僅修了兩百里路長的不生不死的路軌，川漢鐵路的三四千萬的資金在未動工之前差不多也就有快要煙消雲散之勢。重要的原因在當時的人所觸目到的便是辦事人的中飽。一方面中飽的惡習差不多是中國社會的胃痛，而中國的資本的來源又敏不過這個無限量的中飽，所以像盛宣懷那樣比較有點產業上的智識的人他自然會提出這種國有的政策而以外來的雄厚的資本來代替民間的類似括骨抽筋而來的一點薄弱的資本了。

盛宣懷所找的財東便是當時由英美德法四國所成立的銀行團，他所要收回國有的對象便是商

辦的川漢粵漢鐵路。

這在形式與實質上結局只是國外的金融資本主義的侵略與國內的封建勢力與資產階級的鬥爭。

商辦誠然是腐敗。他們知道腐敗的原因一大部分是在中飽，而他們不知道中飽的原因又是甚麼。商辦公司的一些董事理事，結果不外是一些腐敗的官僚，即是舊有的封建勢力。由這種腐敗的官僚手裏又接收到腐敗的官僚手裏，這樣便可以免掉他們的中飽，免掉事業的腐敗嗎？

中飽以外還有一個重大的原因在當時的人差不多全然盲目的便是資本帝國主義的剝削。中國人自己要修鐵路，然而一切的材料工具都不能不仰給於外國人，在這中間更要經過幾道的轉折。你想，你中國有多大的資本來供這種層層的剝削呢？所以結果是資本耗費了而事業却沒有眉目。近視

眼的中國人只看見事業的沒有眉目，便率性把自己的經營權取消了而移交給資本帝國主義。這豈不是就給自己園裏的花木被隣人們偷去種植在他們的園裏去了，園主人只看見本園的凋落，鄰園的繁榮，便羨慕隣人的經營的手腕，走去請他們來替自己經營自己園子嗎？

產業國有本是很高尚的政策，借外債來舉辦產業也並不是可以厚非的事體，然而主要的是要你能夠把債權者的帝國主義克服，把你自己的私有財產的慾望克服。這樣的事情在中國能夠辦得到嗎？在中國的當時更能夠辦得到嗎？

所以結果國家的誠意不能敷信於人，而實際上激成了封建勢力與資產階級的流血的鬥爭。

鐵路國有的上諭是那年的五月二十二日（陽曆）下的，必然的反響便是民間的反抗。起初是湖南廣東的人士起來鬥爭。當時外面鬥爭的情形我

們不甚明瞭，大約粵漢鐵路的股本沒有川漢鐵路的來得那樣“括奪”(四川方言，有殘刻的意思)罷，在那外面的反抗運動漸漸陰消下去的時候，四川人的猛烈的反抗熱，却如像死火山復活了的一樣，突然的爆發起來了。

四川的運動照例是要比外邊遲過一兩個月的，運動的開始大約是在六七月間，頓時有保路同志會的成立，全省的大中小的資產階級乃至於無產者可以說全省七千萬人都全部參加了。結果是九月九日的趙爾豐的屠殺，各地保路同志會的暴動，攻打各地的府縣城池，圍攻成都，有一個時期把成都圍得來幾乎水息不通。九月十日清廷命端方做督辦鐵路大臣，把鄂軍先後帶領了幾旅人要去勸滅四川。到這時候武漢才乘着這個機會於十月十日起義，於是各省便先後響應起來，到翌年的二月十二日，小兒皇帝退位，清庭終竟把它二百七

十七年的統治權雙手捧交出來了。

所以公平而且嚴格的說，辛亥革命的首功是應該由四川人担負，是應該由川漢鐵路公司的股東們担負的。雖然他們並沒有革命的意識，然而要他們才是真正的社會革命的發動者，而且也是民族革命的發動者，事實是這樣，這並不是我們目前想有意的阿諛或有意的翻案。這場革命是中國社會史上最典型的一個插話。它是一個階級鬥爭的表現，而且也是由經濟鬥爭轉化而為政治鬥爭的。所以我說它是滬杭甬爭路事件的複寫與其擴大。在敘述中國社會發展史的人，特別是在敘述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或者是反帝國主義的鬥爭史的人，這個插話，便是川漢鐵路的發生、經營，一直到保路同志會的轉化而為暴動而為革命的詳細的史跡，有值得我們十二分留意的必要。我想凡是從事於文化運動的人，特別是四川境內的同志，應該在

目前趕緊把那行將散佚或者已經散佚了的材料盡量的收集起來，加以合理的整頓，那真是一個很有價值而且很有効用的一個事業。因為這件史事在中國社會的發展史上，它不僅是唯物史觀的一個絕好的例證，而且它還明白地指示出了將來的中國的去向。中國的幼稚的資產階級對於當前的敵人的封建勢力的鬥爭算是得到了意外的勝利，封建社會的中心勢力的清庭倒潰了，鐵路國有的政策不消說沒有實現，而且由立憲運動一躍而辦到共和政體，五條顏色的商標也登錄了將近二十年，然而鬥爭中心的產業問題是怎麼樣???? 川漢鐵路不是早已陰消了嗎？粵漢鐵路不是依然還是一個不具的侏儒嗎？重要的原因是怎麼樣？不是它在形式上雖然打倒了它當前的一個敵人——不消說在實質上這個敵人直到現在都還沒有打倒，還有一個更大的敵人，它却只在它的掌上翻筋斗嗎？

這個更大的敵人是甚麼？

就是帝國主義！

帝國主義把中國的經濟權 緊緊的握着了，使你中國成爲一個永遠的鄉村，使你中國人的產業永遠沒有方法發展。

所以保路同志會的運動，乃至結晶於辛亥革命的整個資本主義的革命運動，結果是失敗了的，而它的失敗却告訴了我們一條路：便是中國的革命自始至終應該是反抗帝國主義的革命，因而這種革命不能由中國的資本家的手裏來完成。

中國的資本主義始終是過了時期的一個播種，它在不適當的溫度與各種條件之中終竟達不到它的應有的長成，然它在畸形的狀態之內已經就達到它的衰老的時期——反動的時期了。

(2)

在鬧鐵路風潮的時候，我們還是在成都，而且還是在分設中學。

這說來差不多好像是一種奇蹟。

都喇嘛先生那樣嚴烈的說要斥退我們，我們自分從此以後也不想再吃學生的飯了，然而他終竟沒有掛我們的斥退牌。在我現在想來，他事實上也沒有掛牌的必要。他要斥退我們並不是和我們有甚麼仇恨，或者他也知道我們並不是怎樣可以左右全校的人，他不過想在一般學生面前表示一

番威風，先把我們弱者來做一個榜樣，好教他們震恐。結果他的目的是達到了，只當着衆人怒罵了我們一番，全堂的學生便都俯首帖耳的上課堂去受試驗去了。他們事實上是已經出了堂的，他何苦定要費一番手續呢？

許不過從他自己的口中允許我們復校而且允我們補考，這要說是奇蹟也可以說是奇蹟。

就在我們搬出學堂的一天，大哥回省來了；他和我們同落在東大街上那家嘉定人常住的旅館。

大哥自從乙巳年去省以後，他在日本學了幾年的法政，後來回到上海在盛宣懷的商埠督辦衙門裏做過一向事情，在宣統二年在北京考得了一個法科舉人，得到一個七品小京官的頭銜，分發在法部衙門裏行走。他這次回省來了。他回省的消息早是有的，但沒想出他回得這樣快。

我們是六年不見了。這六年不見的兄弟的重

逢自然克服了所有一切不愉快的情緒，他聽說我們遭了斥退他也沒有十分責備我們，他還安慰我們說：

“斥退了也不要緊，明年好進官班法政學校。”

我接受了他的這個安慰時，委實說我是不免感受了一番驚異。他在去國之前不是再三叮嚀過我，要教我學習實業嗎？他不是常常說實業救國，實業救國，要整興實業才可以富國強兵嗎？曾幾何時他自己去做了一個小小的官兒回來，而他又勸我去學法政了。

他回成都就是受了官班法政學堂的聘請的，成都的法政有兩個，一個是官班，一個是紳班。官班是收容的一些候補官員或宦家子弟，紳班便是一些紳士或其子弟了。法政本來是我們所鄙屑的，而尤其鄙屑的是那官班。那真腐敗得有點程度。那兒都是一些封建餘孽，他們的上學下學都是轎子，

有的還要帶着跟班。這樣的學校，他要去就聘，我們已經有點奇異，他還勸我們去當學生，那真是出自意外了。不過我們那時候對於他還有點原諒；因為他是才回省的人，所以他不大明白學界上的形勢。

他回省便不免有很多的交際，一時不能回家，因此他也留着我們，要我們和他同路。

來訪他的人也很多，都喇嘛先生也是其中的一個。因為分設中學的甲班已經五年級了，每週有兩點鐘的法制經濟，要請他兼任。大約這兩點鐘的法制經濟便成了我和張伯安兩個人復學的交換條件罷？他對着我們大哥說我們平時很用功，成績也很好，不該乘着一時的感情為別人所利用了。他許可我們還是進學去讀書，到來學期再來補受試驗。

就這樣我們在一九一一年仍然得以在成都讀

書，仍然住在分設中學裏面。

回想起來在成都的幾年中，實在是甚麼收穫，甚麼長進也沒有。差可自慰的或者可以說是使我們得以看見了保路同志會的經過，乃至反正前後的一些大小事變，大小人物的真相罷。

記憶已經十分朦朧了。保路同志會成立的究竟是那一月那一天，我已經不能確定。我只記得的那是我們快要受暑期試驗的時候，而且開會一天的確是禮拜。所以推算起來，在陰曆總是六月初旬，在陽曆總是六七月之交。運動的發生離五月二十二日的上諭相差了這麼久的原因，也因為要召集股東會議，不免需費了一些時日。

這次的運動，主持的就是咨議局的一批新人，在開股東會議之前他們已經極力的在鼓勵反對的空氣，因而學生的工作倒反沒有甚麼了。

在開股東會的那個禮拜日的上午，我們有幾個學生在一位瀘州人的英文教員家裏閑談，那時候來了一位當時的青年名士朱山。這位朱山先生好像也是瀘州人，他和羅綸蒲殿俊是一黨的。不消說他也是蜀報的一位編輯，他很會做一筆在當時很覺得清新雋逸的一種舊詩。他人很年青，在當時頂多怕還不上二十四五？

“朱山先生，今天下午的會你去參加不去參加？”英文教習問他。

“我去參加的。”

“你看這一次可以鬧得出一個甚麼結果不？”

“嚇，”朱山冷笑了一下，“不過趁趁熱鬧罷了。”

我們和他本不認識的，看他來了，我們靜坐着聽了他說了這樣的幾句話，我們也就起身告辭走了。

我們有一位堂兄，三哥，當時在鐵路公司做科員，我們每逢禮拜，照例是要到這兒去一次的。在股東會開會的時候，因此我們也得以在那兒參觀。

股東代表大概有二三百人，會場是設在一個天井裏面的，上面搭着棚廠。因為鐵路公司的所在是從前打大小金川封了侯爵的楊遇春的官保府，全部是舊式的建築，沒有那樣寬廠的可供一二百人開會的會場。做演壇的是從前的一個戲台，在前面擺着一張方桌，靠壁和兩側是放着了一排太師椅的。壇上壇下的人都坐定了。鐵路公司的總理——姓甚名誰我已全然不記憶了——一起來搖鈴報告開會。

劈頭所討論的不消說便是鐵路國有的問題，關於這個政策的情形，好像是鄧孝可起來報告的——當時四川的鄧孝可就好像蘇俄的魯那查爾斯基一樣。不消說他的報告並不是純粹的報告，他是

帶有批評帶有反抗意味的報告。會場在他報告的經過中已經就很有幾分緊張的氣味了，在他報告完了之後繼着是羅綸登壇。

羅綸，他是一位很白晰的胖子，人並不甚高。他一登壇向滿場的人行了一禮，開口便是：

“各位股東！”很宏朗的聲音，“我們四川的父老伯叔！我們四川人的生命財產——拿給盛宣懷給我們賣了！賣給外國人去了！”

就這樣差不多一字一吐的，簡單的說了這幾句，他接着便號陶大哭起來，滿場便都號陶大哭起來了——真真是在號陶，滿場的老年人中年人少年人都放出了聲音在汪汪汪汪的大哭。

“是可忍孰不可忍呀！汪汪汪……”

“我們要反對，我們誓死反對呀！汪汪汪……”

“反對賣國奴盛宣懷！反對賣國機關郵傳部！”

連哭帶叫的聲音把滿場都哄動起來了。羅綸

在壇上哭，一切的股東在壇下哭，連公司裏面跑動着的雜役都在哭，不消說我們在旁邊參觀的人也是在哭的。已經不是演說的時候，已經不是開會的時候，會場怕足足動搖了二三十分鐘。

接着還是羅綸以他那很宏大的聲音叫出的，待他看見會場已經稍稍在定鎮的時候。

“我們的父老伯叔！我們，我們，我們，要誓死反對！”

“我們要誓死反對！”砰的一聲在桌上一拳。壇下也同聲的反響了一聲，大家也在自己的席上砰的一拳。

“我們要組織一個臨時的機關，一方面我們要連絡本省的人，一方面我們要連絡外省的全國的同胞，我們要一致反抗，反抗到底！我們達不到目的的時候，我們四川人要商人罷市！工人罷工！學生罷課！農人抗納租稅！”

“贊——成!!!”

兩三百人同聲叫出的這“贊成”的一聲，要用古式的修辭來形容，說它是“聲震瓦屋”，那時一點也不誇張的。

就這樣鐵路總公司的第七次的股東大會搖身一變便變成了川漢鐵路的“保路同志會”。公司總理的主席的位置，無形之間便被羅鄧諸人剝奪去了。“保路同志會”頓時便成立起來，會長舉的是蒲殿俊，這是羅綸當場推薦的，副會長不消說就是羅綸。下面分四股辦事，有總務股，文書股，交際股，遊說股。各股的幹事都是當場的人自己告奮勇來擔任的，不消說都是羅蒲一派的人，他們當時真是有點本領，把那滿場的股東羣衆好像搗成了一團粘土的一樣。

遊說在現在說來就是宣傳，這是很重要的，那

一般的幹事好像是羅綸兼任。遊說股中要分派出四位遊說員向川西川南川東川北各道去宣傳，這也是當場由各人自己來擔任的。我最感覺着趣味是那位朱山先生。那位朱先生，我們上午在英文教員家裏看見他的時候，他不是說過這次的運動只是“趁趁熱鬧”嗎？然而這時候他登壇了。當羅綸在壇上大聲的說：

“川東的遊說員那一位同志擔任？”

朱先生兩腳跨到方桌面前，他說：

“川東的遊說員我朱山擔任！”

他也一拳向桌上打下去。桌上差不多滿面都是春茶碗。他那一拳不幸便打中在一個茶碗上，把茶蓋打翻了，茶碗打破了，茶水打得四處飛濺，手也打出了血來。這朱先生竟有這樣的熱烈，真是有點出人意外。不過就是這位自薦為川東遊說員的朱先生，走到重慶，竟投到督辦鐵路大臣帶着勸辦

四川的使命而來的端午帥那兒去當幕府去了。這雖然是後事，但也後得並不許久，這真是使我有點懷疑，懷疑到當時從事於運動的指導者，究竟有多少是出自誠意。

在同志會的布署大概就緒之後，又是一個臨時動議，便是全會場的人一同到藩台衙門去請願。這不消說是沒有人不贊成的。大家從鐵路公司走出，沿途不消說就是一個很大的示威，街上的市民便都簇湧着跟來，走到藩台衙門的時候，把那轅門裏面的一個大廠地完全站滿了。

這時候趙爾巽已經調京，繼任的他的兄弟趙爾豐還在西藏，在這過渡期間是藩台王人文在署理。這位王人文在民國元年充當過國民黨的領袖，更在前幾年是在上海一品香門前被人暗殺了的。由他後來的行徑看來，他在當時確是比較進步的份子，四川的保路同志會能夠收到那樣的成功，一

多半可以說他的功勞。

羣衆湧擠在藩台衙門的大堂面前，爲首的羅倫先進去見他去了，不一會他穿着朝衣朝冠的走了出來。羣衆狂歡的鼓掌。一省總督部堂，儘管是署理，要出來和羣衆見面，這在當時可以說是破天荒的事體。

一個師爺提了一把太師椅來，王藩台立在太師椅上和羣衆說話。他真是再溫和也沒有。滿臉都堆着笑容，很心平氣和的說。他說，大家的來意由羅副議長已經傳達了給他，他始終是表示同情的。他自己雖是貴州人，但是四川是他的祖籍，所以四川實際上是他的鄉梓之邦。只要於國計民生有關休戚的事情，在他職責上，無論怎樣是要力爭的，更何況是關於桑梓的利害。所以這次的問題，他對於朝廷要力爭到底，在他在任的一天他總決不負桑梓的希望。他希望大家安心。

這真是從古以來所未有的奇事：以一個官僚而能和民衆接近，而且對於民衆煽動。素來是怕官怕慣了的百姓，得到了官府的這一道護符，他們還有甚麼顧忌呢？於是乎保路同志會的氣勢便真好像是在火上加油了。

(3)

保路同志會在當時有兩個口號，一個是“庶政公諸輿論”，一個是“鐵路准歸商辦”。這聽說是從光緒皇帝的一道上諭上摘下來的。這兩個口號把當時的那個社會革命的精神表示得很完備的，前一個是參政權的要求，後一個是財產權的爭鬥。兩個一合併起來，正好是經濟鬥爭與政治鬥爭打成了一片。

羅藩是接近康梁一派的人，因而他們對於光緒皇帝特別崇拜。上面的兩個口號是自光緒的上

諭可不用，由保路同志會發出來的命令，是四川人在爭路期中一律都要供光緒皇上的牌位。理由不消說是戊戌政變的一個插話，表示這位滿州人是一位英明天子，而同時川漢鐵路准歸商辦又是在他在位的時候實現的。這個策略在當時的指導者中可以說是傑作。保路同志會有的是錢，因為有鐵路公司做背境。宣傳的文件因而也層出不窮，如像小冊子，如像日報，都絡繹發行，還發行了無數的光緒皇帝的牌位。那牌位是用長條的黃紙印的，正中寫着“大清德宗景皇帝之神位”，左右兩邊寫着“庶政公諸輿論”，“鐵路准歸商辦”的兩個口號。這在現在想起來，覺得好像有點滑稽，然而它在當時的効力的確在後來的傳單標語之上。每家每家的人都把這種黃紙條來貼自己的門口，一早一晚都焚香點燭的禮拜。

這給大家的效果是怎麼樣？

這使運動帶着了一種宗教的色彩，利用着封建時代的迷信，無形之間把羣衆在一個目標之下統一了起來，團集了起來。

在封建社會的教條之下束縛久了的人，最怕的是“犯上作亂，不忠不義”的罪名，假使你硬直莽撞的要教他起來造反，要教他起來革命，那不怕你就要殺他的頭，勦他的家，他也不敢担負這個罪名的。在當時從正面來運動革命的人，所以總難得到羣衆的響應，總由羣衆誤會為“亂黨”或“會匪”的也就是這個原故。好了，大家這次却供的是光緒皇帝，大家的行動是對於皇帝的忠義，所以無論怎樣都不會是造反。大家有了這樣的一個安心，所以不期然而然的便全部響應了。

鐵路的股東是由各縣派來的代表，在成都所擬定的宣傳方針，在成都所擬定的運動步驟，便照樣的傳到各鄉各縣，於是俄頃之間而運動便普遍

於全省。

在成都除每家人家或商店都要供光緒皇帝的牌位之外，每條街道都要紮割“聖位臺”，便是在街心紮割一個臨時的臺子，同樣供着光緒皇帝的牌位。舊式的街道本來是不十分寬廠的，在這街心要搭上一個聖位臺，那街道兩旁差不多是不留遺地的。臺層又並不甚高，有的從那下面通過的時候也叫你不能不把頭低着。

這個建築真是發生了不少的效果。

當時的市民非常的虔誠，對於聖位臺的紮割煞費苦心，有的裝飾得很輝煌，結彩張燈，每日每晚都要大香大燭的三跪九叩，那是不用說的。

最有趣味的是對於當時官場上所發生的影響。市民在頂禮皇帝，無論是怎樣反動的官僚，他不能夠哼出“不是”的兩個字。當時的四川官界乃至各校教職員之類的準官界有一種很流行的惡習

便是坐弓桿轎子。這弓桿轎子就如那名目所表示的一樣，兩枝轎桿朝天穹窿出就好像兩張彎弓一樣。但同時在橫的平面上也是取的弓形，結果是形成一個橄欖形，兩頭是尖削着的。兩頭的轎夫把轎子跨在肩上剛好挾着一個頸子。那在轎子前後的二把手或三把手是用兩肘緊挾胸廓，兩手緊擎着轎桿的。這種轎子自始至終都是跑步，跑的時候一前一後的轎夫只是硬着頸子向前竄，兩手擺搖得很高，口裏只是“邊讓，邊讓”的亂叫。像這樣跑當然很容易疲倦的，所以每乘轎子的後邊總有三四個跟着跑的空手，預備着在街上隨時的換班。

這樣的轎子跑起來很快，而轎身又高，坐轎的人真好像是坐在雲端的一樣，那不消說是很有威風的。這不知道是那一位發明家所發明的東西，我自出省以來還不曾看見過。我想這大約是在上海或者海外生活過的人發明出來的，因為他們習慣

了那外邊的電車或者汽車的生活，所以他們在可能的範圍內要發明出一種調子比較輕快的機關，大約那橄欖形的弓桿或者也就是從電車下面的發條裝置所脫化出來的罷？不過那全體的結構好像很不安定的樣子，因為重心離地太高。因此偶一不慎也有橫倒在街上的時候。

這些都是不要不緊的問題，但我在這兒不厭縷述的是在證明聖位臺的收了意外的效果，證明當時的這個奇怪的戰略真是高妙。

我們可以想像了。你想，成都城內每條街都有聖位臺，而每座臺子至多只有一人來往高，那裏通得過官長老爺們的轎子，更那裏通得過那種作威作福的橫衝直撞的弓桿轎呢？於是乎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位台低而弓桿轎廢，成都的市面真是比下上諭禁止還要神迅，立地便斷絕了肩輿及別種交通機關的往來。我們再可以想見的，便是一切的官

僚，就是督撫司道，在他們有事要出衙門的時候，都不能不自己走路了！這是多麼珍妙的一個現象，多麼痛快的一件事情呢！

有一個笑話。

成都是有滿城的，就在城內的西南隅。在保路同志會成立以後，滿將軍有什麼事情要去拜會總督。他坐着轎子從一道城門出城，走不多遠便遇着一座聖位臺，他問明緣故這道供的是光緒皇帝，他在轎裏說：

“啊，這是咱們的主子，趕快回轎，趕快回轎！”

回轎去從另外一道門出城，又遇着同樣的聖位臺，他又叫道：

“又遇着咱們的主子，趕快回轎，趕快回轎！”

就這樣他走了三道門終竟走不通，弄得他一直不能出滿城一步。

你想，這是多麼有趣的事體呢！在當時成都的

人差不多個個都引以為快談。效果倒不僅止是滑稽痛快，最大的作用是剝掉了官府的虎皮，證明了他們的屈服，證明了他們在自己的戰略之下投降了。這同時在另一方面便增長着自己的戰鬥的熱力與對於團結的信心。

在成都方面的情形是這樣，我想在地方上的各府州縣的情形大約也不外是這樣罷。幾千年來的官威一時便倒折了下來，這在當時倒不能不說是天變地異呢。

這種情形在王人文在任的期中不消說是繼續着的，就到了趙爾豐上任之後，那起初的半個月，他也沒法變更。

趙爾豐是有名的殺人狂，四川人叫他是“屠戶”，他本來是一位武將出身，從前在四川的甚麼地方勦匪，硬把一村的人無論老幼男女都燒殺乾淨了，那是有名的事實（這個事實，四川人大抵都是

知道的，我現在把那地名忘了）。他後來去經營西藏很有點功勞，大約也就是用他的殺人的本領去威駭震壓了那些未脫原始性的西藏人的。就因為他有這些殺人的本領，又因為他們趙氏一門是清室的重臣，所以清廷把他提拔起來做了四川總督。

四川人都有點怕他。聽說他要從西藏回來，大家都有點懸心吊膽。所以一方面對於他表示迴避，一方面對於王人文便盡力的挽留。但是你那裏迴避得開，你那裏挽留得住呢？王人文在他未到任之前便被他參了一本，說他收攬民心，養癰成患，結果王人文是革職調京，而屠戶公然到成都來了！

趙屠戶到成都來的時期我現在記不確實，大約是在陽曆八月中旬罷？他到成都來以後誰人都豫想得到他定會有一番的舉動，但是他初到的半個月，至少像有半個月，他硬是弄得來一點也不能舉動。

那樣有名的屠戶上任的當初爲甚麼不立即放出三把火出來，這一方面是證明當時的運動已經深入於民衆之間，所以他不敢有所造次；同時也怕是他自己的官階已經達到了使他要持盈保泰的時候。假使滿清政府不操之過切，不要那樣火迫他，他一方面以恩惠的形式軟化那些智識階級的首領，對於地方上的運動逐漸的用嚴烈的手腕來取締，四川的亂子想來也終不會鬧到那樣。但是滿清政府一再的逼迫他，甚至到了後來一再的對於他表示着不信任，於是逼得他在九月八號終竟把羅綸蒲殿俊及其他的幾個領袖通同拘禁了起來。

在這次的運動中，蒲殿俊自始至終是沒有出過水面的，這在他們的計劃中便是預先準備着一個退路，預備到高壓臨頭的時候，蒲殿俊好出來轉環做一個和事老。終竟是武人出身的趙爾豐，他竟連這點機微都沒有看到，他把羅蒲一併的拘禁

起來了。

羅綸蒲殿俊被捕！這個消息一傳出去全城的人便都震動起來，到第二天九月九號的上午便有成都全市民赴總督衙門要求釋放羅蒲的請願。每家的人都把自己家門口貼着的德宗景皇帝的牌位揭下來，有的捧在手裏，有的頂在頭上，各人手裏拿着一炷香向總督衙門裏湧去。

趙爾豐早是有準備的了。他在總督署的門口及附近的要隘處已經派兵把守着，手無寸鐵的市民剛好走到督署的東轅門，門口的衛兵便一排槍打過來。可憐為頭的便打死了好幾個。附近要隘處把守着的衛兵聽見督署的衛兵在開槍，他們也就開起槍來，打那如潮水一樣崩潰下來的羣衆。這樣，羣衆便陷在槍彈的重圍中了，大家只好向兩街兩側的鋪面裏逃避。槍聲只開了幾次便停止了。街上一街都是光緒的牌位，一街都是線香，一街都是

鬆脫了的鞋子。打死了的人，打傷了的人究竟有多少，當時沒有人作過詳細的調查，我現在連大概的數目都忘記了。我所能記憶的，只是那死者裏面有十二三歲的小兒，也有五六十歲的老媽。街上的聖位臺也同時由軍警折毀了。

這樣一來簡直是趙爾豐造反。成都全市從那天起便開始罷市。對於成都附近的縣份，消息是很容易傳達的，各地的同志會便都暴動化了。對於遠方的縣份，當時的宣傳方法是利用的“水電報”。

“水電報”這個名詞乃至這個方法是四川人特造出來的。方法是在一個木板上寫着成都的消息，叫各地的同志會起義，速來救援；上面塗以桐油。就把這種信板投在川河中，四川的河差不多是四通八達的，它便被傳達到各處下遊的地方去了。這個方法最初是學生會發明的，一應用起來便一個傳十，十個傳百；一處的人接到了一通水電報，同

時又仿造出無數的信板流下河去。在這時儘管當局者在怎樣的戒嚴，要檢查郵電，檢查出版物，然這遍地遍河的水電報它怎麼也沒有方法來扣留了。

暴動的中心是在新津，這兒是首先發難的地方。這兒的同志會把城池攻陷了，殺了縣官，佔領了縣城，各地的武裝勢力便都絡繹的投到這兒來。趙爾豐先派鳳凰山的新軍去攻打，但是派去的新軍不惟毫無戰意，而且有的竟倒向了民軍。舊式的營防軍更全無戰鬥的能力。

新津一縣既不能彈壓下來，各縣的同志軍又聞風興起，趙爾豐弄到無兵可派，無兵可戰的地步，他不得不屢電滿清的朝廷請援，甚至於請撤回鐵路國有的命令以緩和民意了。

四川一局部的亂機已經使中國的全局騷動。各省的咨議局都起來力爭，有的省份（像是浙江）更請朝廷速斬趙爾豐以謝天下。

於是滿清的朝廷弄到這兒也有點蒼皇失措的程度了，它一再起用些舊人來專門對待川事。起初是起用岑春煊爲四川宣撫使，這當然是要利用四川人對於岑春煊的去思，期望他來把四川人軟化的。繼後又起用端方，任命他爲督辦鐵路大臣並兼管四省軍事，把鄂軍帶領了兩旅人進川，叫他勸辦。像這樣一硬一軟的雙刀並用，所謂懷之以德惠，震之以刑威，這在當時的清庭一定煞費了一番的思索而自以爲得計的，然而結果它是鑄就了一個大錯，把它二百七十七年的江山終竟送掉了。

(4)

岑春煊在四川是很有聲望的，他在趙爾巽之前做過一任四川總督。由四川又轉到兩廣，在小兒皇帝即位之後大約他和攝政王有甚麼不睦，便把位置失掉了的。

他在四川的德政其實並沒有甚麼，據有識者說來他倒很興了不少的苛捐雜稅，然而一般的四川人愛戴他真好像自己的父母一樣。他之所以得到這樣好的聲望，是因為他的官紀很嚴，他很能懲辦得一些貪官污吏，滿清二百七十餘年間的統治

在官場中已經凝集成了一個牢不可破的貪婪的惡習，一般的官府均以貪贓枉法爲能，在上的需爵收賄，在下的括骨抽筋，“官官相衛”，讓你受苦的民間硬是呼天無路，籲地無門，人民的怕官府真是比怕馮羅王老子還要厲害。然而在這樣的官場中岑春煊的治蹟却特放了一個異彩；他差不多好像是專門生來懲治那些貪贓枉法的酷吏的。官吏有貪枉的行爲他准許民間控告，被控告了的官吏十個有九個都是革職，因此使官場中的人，人人自危，而使民間的百姓也就人人稱快。

四川人爲爭路的問題，正弄得來騎虎不能下轡的時候，聽說“岑制軍”要來了，一般的人士是怎樣的歡欣鼓舞。岑春煊在他未入川之前，他有一封告四川父老子弟的文電，那措辭的婉婉動人而且得體，那真是極盡了他的宣撫的能事。

電文並不甚長，只有五六百字的光景，四川人

把它當成福音書一樣誦讀，在日前我和幾位朋友談到這個問題，都還有人能夠把它全盤背誦出來的。我現在把它開首的幾句寫出來罷：

“春煊與吾蜀父老子弟別九年矣，未知吾蜀父老子弟尚念及春煊與否，而春煊則未嘗一日忘吾父老子弟也。乃者丁此不幸之事，使春煊再與吾父老子弟相見，頻年契闊之情竟不勝其握手歎歎之感，引領西望不知涕之何從，吾蜀父老子弟一思春煊此時方寸中當作何狀耶？……”

就這樣他很娓娓婉婉的開腔一聲春煊，閉腔一聲吾蜀父老子弟，他以家人父子的感情來動人，而又不失掉他自己的身分和目的。他的目的是在平定四川的擾亂，而他這樣寥寥的幾百言實在可以當幾百萬的大兵，四川人險些就被他這樣的一篇文字軟化了。我們時常想，清庭假使專門倚賴岑

春煊，讓他一人單人獨馬的進四川，那川事一定會立地平息，因此則鄂軍不會調空，漢武不會起義，而清庭也不會那樣迅速地便遭了滅亡。然而他終竟自己檢取了一條滅亡的道路來走。他才命令岑春煊去宣撫，而立地又命端午橋去勦辦，一方面表示他信人不專，一方面也令宣撫的人無從下手。因此岑春煊走到漢口便逗留着了，而端方則威風凜凜的執掌了兵馬大權，浩浩蕩蕩的入川。

端方在入四川之前也是有一通文電的，那和岑春煊的告蜀父老子弟的書，真可以說是一個絕好的對照。端電是告示體裁，文字之長將近萬言，這在形容上已和岑電大不相同，而在內容上更有天淵之別。

那麼一通長電文，我現在當然不能記憶了，只是開口一聲“本大臣”，閉口一聲“爾川人”，把四川人看來好像還是三千年前周武王伐紂時的蠻子一

樣。他又拚命的誇張他屠殺革命黨的手腕。他說他從前在山西怎樣怎樣的懲治亂黨，在江蘇又怎樣怎樣的剪滅會匪，他現在帶領大兵前來，假使川人還是冥頑不靈敢於上抗王命的時候，他要勦滅四川。

這樣一來簡直把四川人逼得來絕體絕命了。縱橫是已經成了亂黨的，投降也是死，不投降也是死，唯一的幾稀的生路便只有反抗到底了。

端方在他的收集骨董，講究一些中國式的考古學上，比較都還是一個聰命的人，說到政治上的處理上來，我不知道他怎麼是這樣的愚蠢。自然這樣的電文不必一定是出於他的手稿，在他的幕府裏總還有不少的名下士的，或者說不定那樣尊嚴的一篇文章怕還是我們年青的名士朱山先生做的罷？他們習慣了他們的官威，以為從來的百姓只要一加威駭便可以俯首貼耳的，然而他們不知道百

姓的忍耐已經達到了他的沸騰的焦點了。用舊式的眼光來批判，要說清朝的滅亡是由於端方的這通電報也不能說是過論。因為有他的一來使四川的禍亂愈見蔓延，而且不久之間武漢便起了響應。

武漢的起義在現在的人不消說是誰也知道是那年的十月十號，但這個確實的消息我們得以知道了的是一直在十一月二十五號成都獨立了以後。在成都獨立以前，官界是把外來的消息封鎖了的。後來我們看上海的報——好像是神州日報——畫有一方漫畫嘲笑岑春煊的，題字為“岑三少割髮棄袍”。岑春煊自受命為宣撫使以後，因為權限的不分明，他自己逗留在漢口不進，終於遇着了武漢革命軍的爆發，弄到他演了一場曹孟德的舊戲逃回了上海。

岑春煊是沒有入夔門一步。而入了夔門的端

午橋那簡直是入了鬼門一樣了。

端午橋帶領着大兵浩浩蕩蕩的聲明要來“勦滅”四川，在他剛走到重慶，他的後路便已經斷了。重慶是四川革命勢力的策源地，他羈留在這兒的時候，部下的軍心已經不免在動搖，在這兒已經不是“勦滅”的時候，却是他自己逃難的時候了。他假如有，岑春煊那樣的聰明，率性把鬍子剃了，一個人改裝逃走，或者他到現在都還存命着，至少他的“陶齋吉金錄”或者是更續編了好幾本出來了。但他到底沒有這樣的幽默，他逃命也帶着兵隊同走，他愈朝西方前進，終竟走到了資州。在這時候重慶和成都都先後獨立了，他這個釜底的遊魂終竟為他的所帶來的鄂軍所殺。

他死時的照片我是看見過的，一個大洋磁盤裏面盛着被斫下來了的頭首，由一個兵士捧着。他自己不肯唱“割鬚棄袍”的舊戲，却讓着這位兵士

來唱了一場“沙樂美”的新戲了。

剩下的還有一位孤城落日的趙爾豐。他把外界的消息封鎖了，但這是對於我們的封鎖，對他自己乃至當時的官場當然是開放着的。

上海的新聞紙，特別是現在已經若存若亡的神州日報和已經消滅了的民立報，那真是做了一番很偉大的工作。中國人慣會造謠的偉大的本事在革命的運動上真是發揮盡了它的偉大的潛能。清庭事實上是到第二年的二月纔退位的，然在上海的報紙上在辛亥年的十一月便已經崩潰了。又譬如我們四川那事實上是到十一月二十五日才宣佈獨立的，然在上海的新聞紙上都成了老早便為保路同志軍所佔領了。這些在起初的官場，不消說它很知道是在製造謠言：因為清庭在武漢起義之後由山西陝西經由對於趙爾豐還有無數的電報

來斥責。然在十月尾和十一月初環繞着四川的省份差不多全部都獨立了。湖南是十月二十二獨立的，陝西是二十五，雲南是三十。十一月七日的貴州，廣西，八日的廣東。從此以後四川的官場便成了一個孤島完全和清庭隔離了。在這以後的上海的謠言，你要不信但你怎能不信呢？不然，像趙爾豐那樣倔強的人，他到十一月二十五日在滿清並未滅亡之前終竟把政權平和地移交了出來，那真可以說是一個意外。

趙爾豐自從九月八日把羅綸蒲殿俊單拘禁了之後，我們對外的宣傳是說羅蒲遇害，其實他對於他們是十二分優待的。他只是不許他們出來活動罷了，一切都把他們禮如上賓。我們那時聽說他們在督署裏面，時而打麻將，時而唱京戲，並且時而還飲酒賦詩——這些名士假如有詩集傳世，那時的詩一定有不少的慷慨淋漓的傑作。所以他們在那

兒反是得了一兩個月的休養了。

外面的形勢日非，四川在中國成了一個孤島，成都在四川又算成了一個孤島。在那快要獨立的前幾天，同志軍已經有來圍城的消息，四鄉進城來的蔬菜以及米糧的來路都已斷塞了。在這時候假使四川的新軍裏面真正是有有革命性的人在那兒主持，四川老早是已經獨立了的，然而妥協成性的我們四川人乃至全中國人，就給全中國人把辛亥革命的成功使北洋軍閥的首領袁世凱收得了的一樣，我們四川人把成都獨立的首功却讓給趙爾豐去了。

成都獨立的首功無論怎麼說是應該趙爾豐來擔負的。他在要獨立的前幾天終竟把羅蒲諸人釋放了。他在免使省民塗炭的口實之下（其實是想把政權交給溫和的一派，以保全自己的生命財產），和他們定下了幾條條約。一條是宣佈四川的獨立，

由咨議局的議長蒲殿俊做正都督，在正都督之下設副都督二人，一位是羅綸，一位是趙爾豐的私人陸軍標統朱靖瀾，兵權仍操在朱靖瀾手裏。還有一條便是趙爾豐自己的退位，他把印信封存藩庫，他自己退回打箭爐去繼續經營西藏，一切的旅費政費仍由四川支給。重要的內容大概就是這樣，於是乎在十一月二十五日成都的獨立也就給中華民國的存立一樣，在新舊雙方的合意之下乃至是在類似任命的形式之下，也就實現了。就這樣中國便說是革了命，四川也就說是革了命。

趙爾豐在後來雖然遭了殺戮，但從革命的立場上說來成都的反正總應該推他為首功，而從舊式的觀點來說那他已經是做了貳臣。滿清滅亡之際，貳臣之多實在今古無兩，這裏自然因為有種族的界限在裏面，然而也就是封建思想已經失掉了它的勢力的證明。我們平心靜氣的來說，像趙爾豐

對於清庭其實可以說是相當的鞠了一下躬，盡了一下瘁的。我們拿當時各省起事的先後和獨立的先後來說，四川是起事的最先，然而獨立得差不多是在最後。無論怎樣趙爾豐在四川和真正革命的民衆總還打過幾次仗火，支持了兩三個月，弄到後來實在是山盡水窮，他又才把政權交卸了的。他對於清庭總算是可以對得住罷？然而清庭對於他怎樣？清庭昧於局勢的已經變遷，一味的對於民衆加以壓迫，一味的對於他個人加以責嘆，任命了岑春煊來宣撫，又任命了端方來查辦，把他看來只成了一個罪人，他矢盡了忠誠，樂得博到了一個“屠戶”的美名的一生，到這時候恐怕也很不免有知己的寥落感罷？在反正的當時聽說他自己本有想做第一任都督的意思，然而終因為他已負有“屠戶”的美名不能壓服人心，所以他也就自行退讓了。所以從滿清的立場上來說，他比雲南的李經義，廣東的

張鳴歧，廣西的沈秉堃，乃至王莽再世的袁世凱，雖然已經是貳，總還算貳得不甚厲害的。

立在反動的立場上對於趙爾豐可以容恕的地方多，立在革命的立場上對於四川當年的新興勢力的指導者們實在是萬分不能容恕。羅蒲諸人本來是不贊成革命的妥協派，他們在長時期內也失掉了他們的自由，那是有可以藉口的；但當時自命爲革命黨的，在獨立以後雖然湧出了不少的人材出來，在獨立以前他們到底在做甚麼醜夢呢？特別是四川的新軍界。統觀各省的獨立差不多全部都是新軍掉頭，這正是資本制度戰勝了封建制度的最積極的表現，然而四川的新軍，雖然有一小部分投到了保路同志軍的陣營裏，而大部分却只保持着一個消極的不動主義，竟使趙屠戶那樣的一個獨夫在成都也支持了兩三個月。坐使政權終竟在暗默中從反動派又移到保守派手裏去了。從這

兒便種下了二十年來的不斷的醜惡的政權競爭的種子。天下從此多事，四川也就從此多事了。

(5)

辛亥革命的結果，中國的支配權是由反革命派移到反革命派手裏的，形式上雖然號稱革命，而實質上則中國資產階級的革命，一直到現在都還沒有成功，它一直到現在都還脫離不了封建的勢力。然在革命成功了的當時，我們一班的人是怎樣的歡欣鼓舞的！特別是我們四川；因為它鬥爭的時候長，所以得到勝利的時候也就分外狂喜可怕。

先從我們一些小孩子說起罷。我們最高的喜樂便是等不到獨立的宣佈在頭一天晚上便把毛辮

子剪了。在這時候我們拿着剪子去強迫一些怕事的學生和首鼠兩端的老教員們，我們趕得他們雞飛狗跳。特別是那位都喇嘛先生，我們拿着四五把剪子把他圍着，弄得他無處可逃，終究在談笑之間把他的毛辮子的支配權授受下來了。

萬歲！革命成功萬歲！從此以後，就好像只消大家把頭上的毛辮子一剪，中國便可以一躍而為世界上天字第一號的頭等強國一樣。

這樣歡狂的態度，那些得到政權的新的支配者比我們更要荒唐。他們在十一月二十五日在成都的皇城正式做了四川省的都督，在一切的政權都是沒有穩固的時候，他們下出了一道奇怪通天的命令，便是大賞三軍，准許新舊的軍士自由十天，不受軍律的拘束！這真不知道是何意思而出此高妙的政見。從來已經就是帶着獸性容易放縱的軍士，還要准許他們自由十天，成都的市面在那幾天

真可以說是百鬼晝行的世界。

新軍是駐劄在城外的鳳凰山，而且多少是有點新式的紀律的，都還看不出他們的怎樣的驕縱。可怕的是那營防軍了。

營防軍穿的是舊式的號勇褂子，頭上用墨色的紗布像印度人一樣打一個很大的包頭。在這時候他們的包頭愈見大起來了，在額上加上一個英雄結子，有的還要加上一頂“英雄草帽”（就給京戲‘小放牛’唱花旦的戴的花草帽一樣）。兩邊的鬢上各各倒插一朵通草花。號勇褂子上更披上一件斗篷（所謂“一口鐘”），把明晃晃的馬刀廠插在腰邊。短褲下用黑色的紗羅打着裹腿，裹腿上一邊也插着一枝匕首。脚上是線耳子草鞋，草鞋頭上紮一朵很大的絨條花。

就是這樣的裝束，他們把兩個肩頭聳着，把兩隻肘拐廠開，兩個品着在街上走的時候，一兩丈寬

的街面便都被他們佔領了。

我費了很大的力量來形容，但我恐怕讀者還是得不到那種可恐怖的光景，因為我們沒有當場的實感的人會以為這是一種假裝行列，乃至是如像在戲台上所常見的武生裝束。是的，就有這樣的一個觀念好了，總之他們就儼然是在舞台上裝扮着的英雄，不下裝就走下舞台來了的一樣；但他們却比任何的名優還要演唱得過真，因為他們能夠使得任何的人都感覺到他們是可怕的英雄。他們在街上滿兜橫的搖擺，開口一聲老子們怎麼樣，閉口一聲老子們怎麼樣，平常在街上點綴風光的女學生和新式的女性可以不用說，就連出門買菜的老板娘了頭子都不敢在街上走路了。

這樣的情形就是我們狂喜着的一些年青學生也都預感到這新興的天字第一號的頭等國家總怕要遭一次厄運。

四川的獨立本來是重慶在前，成都在後的，照我們現在用公平的眼光來批判，羅蒲假使真是非凡的人才，假使真是以國家的前提的人，他們不應該作政權的迷戀者，在趙爾豐把政權交出之後便應該和重慶的一部分勢力合併起來，最好是自己退讓；因為他們本來不是革命黨人，不應該來應受革命的光寵。然而他們却連做夢也沒有夢到，否，他們甯是出馬便和革命的一派對立的。在他們得到了政權之後，一上台便撒下了上面所述的那樣的一個爛污，這用舊式的話來說，便是一出馬便把民心失掉了。而他們對於政權的分配是怎樣呢？依然還是他們川北一派人的包辦。於是他們在上台之後便豎下了無限的敵人。第一是和他們對立的當時的革命派，第二是掌有實力的新軍派，第三是川北以外的失意派，這些在無形之中便組織成了一個反川北系的大同盟。

革命派的示威是在獨立後的第三天。就在宣告獨立的那一天的下午有一張佈告出來，是說在二十七號的上午要在南校場召集省民大會，希望各界的同胞來參加。佈告後的署名是

同盟會會長 孫文

四川支部長 董脩武（代）

末尾的年月用的是黃帝紀元，數目好像是四千六百零九年。

孫文！這在當年是使我們怎樣憧憬的一個對象！他的名字在光天化日之下可以出頭的怕這才是第一次罷。有他的名字列着的佈告，就好像他親自在對我們說話的一樣，使我們少年人的心血真是起了高度的沸騰。

開會的時候是很熱鬧的，會場就在我們學校前面的南校場，在我們當然是就地風光。校場正中搭了一座臨時的舞台，舞台上簇湧着不少的革命

黨。革命成功以後的革命黨人真是不少！平常我們時常看見的官班法政的教習，紳班法政的教習，乃至有許多穿軍服帶指揮刀的原來都是革命黨人。

董脩武是四川人後來稱他爲“董太師”的，原來就是東文學堂出身的我們大哥的同學，他學的也是經濟，在紳班法政教書。平常我們也時常看見過他，但我們的感覺真鈍，連革命黨的革字的氣味都不曾臭到。今天他是他的主席，登臺的人大概都是一篇悲歌慷慨的議論。會場上是有軍樂隊助興的，因此也招攬了不少的聽衆來，但這些聽衆不用說是全無組織的，就給鄉裏人來看神會的一樣，來了一批又去了一批。當時的那些悲歌慷慨的演說沒有一句是留在我的記憶裏的，我恐怕同時也沒有句是鑽進了聽衆的耳裏。

總之這是一個對立。顯明的是羅蒲及鄧孝可諸人平時是風頭很旺的，今天却誰也沒有到場，

不過革命黨人中在當時也有對立，便是洋貨和土貨的對立。董脩武所代表的是留學生一派的洋貨，還有是楊莘友們所代表的川省到地的土貨。

我們有一位從堂的姊夫，原來他也是革命黨人，有一天他把我拉着，到楊莘友們的辦事室裏去，我到這兒倒真正感受了一些革命的風味了。

楊莘友王述懷還有其他的一共六個人是反正以後才從牢裏放出來的。他們是在己酉年的年底圖謀革命，在未舉事時被趙爾豐破獲了，丟在了牢裏的，算已經坐了將近兩年的牢獄。他們才從牢裏出來，有的因為忙於奔走竟連剃頭的時候都沒有。一頭蓬鬆的亂髮，一嘴蓬鬆的亂鬚，一個蒼白色的面孔，一雙放着異樣的光彩的鴿子一樣的眼睛，一身的不相趁的大約是借來的衣裳，這樣的革命黨人讓你一眼看見了，令你怎麼也要肅然生敬。我看見他們的握手了。他們的握手和平常不同，甯可說

是扣手。他們是把幾個指頭並着彎起來，就給太極圖一樣彼此扣上的。

六人之中有一位身子特別高，背有點穹，鼻子是一種羅馬式的高鼻的，他和我談過幾句話，說他們不贊成羅蒲的辦法，那是投降了趙爾豐，那時趙氏的家奴。這個人我看是在六人之中的領袖，他也特別忙，和我說不上幾句話又有別的同志來會他，他回頭又帶着手槍出去了。這個人我現在把他的姓名忘記了。他好像是就在那天遭了別人的暗殺。下手的是甚麼人，以及他的身後是怎樣，我完全不知道。

從那辦事處退出來的時候，我的那位姊夫他悄悄的對我說，說他們要暗殺羅蒲。

在革命的期中一個人上臺很快，下臺也很容易。羅蒲一做了都督之後，他們的政治手腕已經落

第，更加以一般智識份子的不合作，他們的末路當然是早已迫在眼前，然而使他們沒落的直接的動力却是他們自己所釀成的兵變。

羅蒲在四川是稱爲十日都督的，因爲他們的都督夢剛好做了十天。

十天，這是新舊各軍的自由假期期滿的日子。羅蒲在東校場檢閱營防軍，自此以後要叫他們重守軍律了。真是可憐的幼稚的政治家！已經放出籠牢的老虎，他們要想憑他們的三寸不爛之舌叫它重入籠牢。兵士們也提出了他們的條件，他們要求要發三月份的全餉。財政權大約在當時也還不曾被羅蒲掌握着，即已被他們掌握，然在已經經過兩三月變亂後的四川，更那有那樣的餘裕。這個要求不能乾脆的答覆，兵士們當場便嘩變起來了，當場便有兵士開槍。羅蒲二先生幾曾經受過這樣的局面，幾曾聽見過這樣的槍聲呢，他們一聽槍聲，就給

林子裏面的瓦雀一樣，立地便逃遁得一個不見踪影。從此便不可收拾了。

兵士的開槍大約是在午後兩點鐘的時份，就從那時起槍聲愈打愈多，愈打愈近，打到天黑的時候一城都是槍聲，而且四處都在放火，一個錦繡的成都城，就好像楚霸王火燒阿房宮，奈羅皇帝火燒羅馬城一樣了。

我們學堂老早是把學堂門關了。我們的都喇嘛先生把我們約束着不準那一個出門。我們在學堂裏守着聽了一夜的槍聲，看了一夜的大火。夜來槍聲很密的時候，城裏的居民差不多家家都出門逃難，學堂門外就是南校場，簇湧到這兒來的自然有不少的人，有的在學堂門外打門，很想進學堂裏來躲避。我們做學生的便主張把學堂門打開，然而‘各人打掃門前雪’的老教條到這時也應用到我們的學堂門上來了，我們都先生却始終堅持着不准

關門。

這真是恐怖的一夜，特別是那學堂門外的難民，他們憂財產之喪失，憂骨肉之分散，憂自己生命的難保，那真不知道是怎樣的惴慄了。在這兒也一定起了不少的喜劇，特別是男女間的愛情，稍稍富有想像力的作家，他很可以在這樣的背景前面製造出一些甘脆的 Romance；甚至於他或者還可以把自已來做主人公，在這時候和一位假想的女王發生了戀愛。我們學生要主張打開學堂門的心事，其實有一多半是這樣的動盪，造夢的動盪，在那兒說話的。

槍聲和火光在天將亮的時候也漸漸熄滅了。邵先生把我們關到了八點鐘，到這時候他不能不讓我們出學堂門了。

(6)

兵變過後的成都真是有不少的悲喜劇景。

我在第二天清早，因為關心着住在東門的一位堂姐，一等學堂門打開，我便跑出去了。

街上不消說是很慘淡的。避難的人已經絡繹的在回到自己的家裏。

原來變兵都是向天放的槍，所以也從沒有看見有甚麼死傷的人。夜間看見的東一處西一處的火光真好像全成都城都成了火獄的一樣，其實只是燒了幾家背僻處的當舖，有的聽說還是當舖自

已放火燒的，因為它遭了劫搶，火燒後便免得償還，這好像是他們開當舖的人的規矩。

藩庫是燒了，兵械庫的確也搶了。在我走到南門大街的時候還零星的可以看見一些變兵，那全身的披掛真可惜我那時沒有照相機，沒有拍得一張照片下來。那蠢如豕鹿的丘八老先生真是蠢得要命。他們曉得銀錢貴重，當然搶了一身不少的大洋和銀錠子。他們曉得槍彈是很好的武器，同時便也搶了一身的槍彈。據我所親眼看見的，每人平均差不多要拿四隻槍，手裏一邊拿一隻，肩上也一邊掛一隻。彈囊那真是不計其數，橫也是，順也是，腰上也是，肩上也，疊疊重重，重重疊疊的掛着。但是，你想，你一個人那有那樣大的精力呢？你已經搶劫了一個穿夜沒有睡覺，身上不消說已有不少的黃白，你還要加上這樣多的一些槍彈！

這個情形剛好就像資本主義這位次貝大老爺

一樣，他拚命的把產業發展，發展，發展，把資本集中，集中，集中，結果是弄到自己的崩潰，崩潰，崩潰。

那些丘八老先生到了那樣的時候，已經不是使用槍彈的老虎，已經是成爲了駝槍彈的驢子了。有的我看他們行步都很艱難，有的又好像是煙癮發了的光景。

在這時候各街已經有所謂自衛團出來，就是各街的江湖，各街的流氓組織成的。他們在這時候把平常很少看見的馬刀關刀牛角叉通同擺出來了。他們這些在晚間搶劫的時候，其實就是有力的隊伍。晚間丘八老爺替他們打衝鋒，他們便去接二陣，所有各街的搶劫，一多半以上是他們幹的。然而他們搖身一變，現在要保衛街鄰了。還是該丘八老爺背時，他們已經成了驢子，不要說手中還有關刀馬刀，就是空手把他手裏的槍扭一隻來也要把

他解決了，結果是走慢了的一些變兵便都丟了性命。有的把自己的槍彈在街上丟了便逃起命來。

最繁華的東大街，商業場，也搶劫得最厲害。一街都是包洋貨的紙頭，一街都是打破了的香水瓶牙粉瓶粉瓶，有些地方差不多也一街都是粉。在這時候錦繡的成都真真是呈出了香街十里了。

變兵因為自衛團搜選得很厲害，便都藏匿起來了。有的不消說也趕快改變了自己的裝束，好在改裝也很方便，他們是有現成的衣服搶劫來了。在東大街遇着了一件滑稽的悲劇。

一位上穿灰鼠馬褂，下穿狐皮袍子的人在街上走着，有幾位自衛團搶前去扯着他，有一個攔腰便給他一“梭標”(矛)，把他斃倒了。

原來這位化了裝的老爺是露了馬腳的，是他搶的時候忘了搶褲子，還是換的時候忘記了換，在他的狐皮袍子之下露出的是有一條有紅記的

軍褲。這位老爺當街便被幾位自衛團結果了，但更有趣味的是他們把他的灰鼠馬褂狐皮袍子剝開，裏面又還現出了一件女人的狐皮袍子。

趙爾豐這時候還住在他的總督部堂的衙門裏，他和各街的自衛團一樣，都還有點機敏的手腕；各街差不多都貼出了他的總督部堂的安民的告示出來，反而是沒有印信的。因為藩庫燒了，我想來四川省總督的印信怕也一定燒了。

走到堂姐的寓所門前，門是緊閉着的，門上貼了一張紅紙的招租帖子。我一看便知道那是姐丈寫的字，自然是不由你不發起笑來。有了這樣的一張避邪的符錄，我想來他們一定是安然無恙的，門也不會容易叫開，我又拆到青石橋街去看我的大哥。那時候他住在青石橋街的一家很大的公館裏，因為他的官氣太盛，我平常都少有去看他。待我走到他的公館門前，依然是同樣的一張符錄。窺竟是

出過洋的人要不同一點，不比一些舊式的公館人家，一聞槍聲，一見火光，便全家全眷都出門逃難，贖下一座空公館讓自己的用人及鄰近的無業者便把“啓發”打了。——這“打啓發”的三個字就是那次兵變之後傳出來的話柄，好像那天晚上的新軍的口令便是“啓發”。起初嘩變的大抵是營防軍，當局者似乎也曾去調鳳凰山的新軍來彈壓，然而新軍一進城也跟着變了。一到晚來的時候，彼此成羣結隊的搶劫，彼此也在互問口令，於是東也是一聲“啓發”，西也是一聲“啓發”。從此以後“打啓發”三個字便成了成都的方言，大凡是在上海人要說“揩油”兩個字的地方，成都人便叫着“打啓發”。

在兵變後的幾天，成都完全是無政府的狀態。各街的江湖派，恢復了水滸傳上的梁山泊的風光。他們在各街都組織公堂，牛角叉，槍矛，青龍偃月刀，

大紅燈籠，擺佈得十分威武。丘八老爺的一幕掩閉了之後，現在又是陳涉吳廣的草莽英雄的一幕登場了。在城內已經有不少的這樣的英雄然而更加之以各縣的保路同志軍進城來成軍，那真是開出了古今未有之奇局了。

羅蒲自登台以後，因為縱容兵士的結果弄到了一個不可收拾的地步，而同時新軍又不在他們手裏，他們便提出了一個政策招各路的保路同志軍進省來成軍，這一方面算了結了一場公案，而同時也想借來作為彈壓舊軍，抵制新軍的工具，這在羅蒲也要算是一舉三得的事體了。因為這樣的原故各路的同志軍也就絡繹抵省，然而在他們抵省的時候已經是兵變後的第二天，羅蒲已經跑得沒有踪影了。凡為瞻仰過同志軍的軍容的人，讀到賈長沙的“斬木為兵揭竿為旗”的兩句，絕對不會認為那只是文學家的誇張。保路同志軍軍容有的真

是滑稽得你就要誇張也誇張不到。所謂同志軍，有一部分是平時的土匪，有一部分是各地的鄉團。大部分的鳥槍，梭標，牛角叉，鐵槌，銅槌，鐵鑊，銅鑊，雖然陳腐得一點但總還是軍器；但有的却拿着鋤頭，擋靶，扁担，鎌刀；而有的更異想天開，把一把菜刀綁在竹竿尖上雄糾糾氣昂昂的拿着。我還親眼看見一位拿“吊刀子”的——這“吊刀子”我恐怕是四川話，外邊不知道叫甚麼名字。這東西現在好像很少見了，在從前凡是稍微要講究一點官派的人出門便要帶“吊刀子”，就是一雙牙骨筷一柄西餐用的小刀，同插在一個鞘子裏面。這樣的東西本是用來吃飯菜的，然而那位同志軍，他把小刀抽出鞘來拿在手裏，象牙筷和鞘子便吊在腰間，大有仗有寶劍的鐘馗的身手。你說，這可滑稽不滑稽呢？

但是，朋友們，你們且莫忙單作滑稽的現象而一笑付之罷。我故意的把這些滑稽的現象描寫出

來，使我們大家可以知道四川當年的保路同志軍乃至同志軍的軍事行動，究竟是怎樣的一種真相，怎樣的一種性質。那自然不是羅蒲輩所代表的立憲論者，也不是董楊輩所代表的革命黨人，而是貨真價實的‘××××’！這種××××的威力我們不要把它輕視了，就是他們在竹竿頭上擲的菜刀，手裏拿着的吊刀子，不巳成爲了推倒趙爾豐的原動力，殺死端方的原動力，乃至送葬了清庭的原動力嗎？

我們要記着，辛亥革命是一九一一年，這後於一九〇五年的俄羅斯第一次的革命僅僅六年，先於一九一七年的俄羅斯第二次革命也僅僅六年，革命的性質大略相同，然而革命的結果兩者是怎樣的懸殊了！？我們想，假使中國有經好的指導者，把那真正的革命的民衆從那時起便引到了真正的革命的途上，中國不早巳有充分的力量和帝國主

義者對抗而成爲世界革命的前驅嗎？保路同志會之起直接雖是和封建社會的鬥爭，而間接却是和帝國主義的爭鬥。直接的一步雖然走到了，而間接的一步却忘在腦後去了。問題依然要歸結到中國革命的領導問題上來。中國的革命如在新興的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的領導之下，它終久只能出於向帝國主義投降或畏避的一途，而萎縮到舊有的封建社會的巢臼裏。中國嘯！你究竟該到那兒去？

這些感想，當然不是辛亥革命的當年的任何人所有的。我們在當年個個都幻畫出了一個幼稚的夢，以爲把滿清推倒便可立地富強，但可憐這個夢在滿清尚未推倒便早已幻滅了。

在營防軍猖獗的時候誰也就兢兢業業的預感到一定會有甚麼變亂，結果預期是實現了；然而第二個兢兢業業的預感又發生了出來。是甚麼呢？我們

想罷：那樣多的草莽英雄又闖進了成都城，這在當時的人看來，剛好就和“前門去虎後門進狼”一樣。這時候大家已經忘記保路同志軍是推倒了趙爾豐的元勳，大家仍然把它當成平時的土匪看待了。

然而本是在土匪的領導之下的一些暴民，事實上也不過是一些土匪。他們並沒有一定的計劃，並沒有一定的目標，只是如像山泉暴漲了之後的洪水一樣，翻山遍野的直撞橫衝，發揮他們的無意識的盲目的破壞。

城外的草堂寺旁邊，自從我們初上省的一年，便發起了一個由官紳商學出資合辦公園的計畫。費了幾萬塊錢，費了將近兩年的工夫，剛好把那公園修成，然而同志軍一抵省，他們說那公園是趙爾豐和周孝懷輩的私產，便把它搗毀得連片瓦片礫都不存留了。

四川在初辦新軍的時候，原豫備的是兩師人

的計劃，在鳳凰山駐劄一師，在新津駐劄一師。因為新津是入西藏的通道，駐劄一師人在這兒是為要控制西藏的。自從我們上省的一年，在新津城外便在建築一座西式營房，前後也差不多費了兩年工夫，經費更不知道費了好幾十萬，剛好快要落成，而同志軍便起來了。他們也說那是趙家的私產，把它搗毀成一片的磚塊。這是我們在反正後回家時所親自去憑弔過的，然而這個消息早已是傳到了成都。

這樣的盲目的破壞怎能不使當時的有產者驚愕呢？有產者的想念中所必然發生的便是想靠有新式武器的軍隊來防禦這行將臨頭的第二次的禍災；一些軍政上的人自然也便樂得乘機而扶殖自己的勢力了。這個想念最明顯的是反映到我們學生的心中。當時成都的學生界發起了一個臨時的學生志願軍的計劃。以武備學堂為中心，凡是志願

的都到那兒去戍軍，略受訓練更要到街上維持秩序。說來我當時的一個小資產階級的根性真是有點可憐可憫。我不消說也是志願者的一個。那在兵變後的第三天了，我把我的行李也搬到武備學堂去。武備學堂那時候已經改成陸軍小學，建築是全然西式的，因為它在北門附近，和南門區域太相懸隔了，我直到去當志願兵的一天，還不曾去參觀過一次。我把行李搬到武備學堂去了，但第一步便使我驚駭了的，是那陸軍學生所用的睡臺，那窄窄的只剛好可以容下一個人的身子的睡臺！

“這怎麼能夠睡呢？”在我想去當志願兵的志士的心中，劈頭便發生了這樣的一個問題，這可和志士的招牌抗衡起來了。要當志士便要這樣的受苦！怕吃苦的心事終竟佔了勝利，把志士的招牌火速折了下來，行李剛好搬進寢室，又由原用的挑腳又搬出學堂門，和我同去又同出的也不在少數。這樣

滑稽的一幕，我現在回想起來真真禁不着自己嘲笑。但我也想把這件往事當成懺悔的資料，我只是想寫出當時的一般青少年的心理大概也和我這樣相差不多。我自己當時就忍耐着準備去吃一點苦，準備去當一個忠實的維持秩序的好兵，結果只是當一個軍閥的爪牙，富豪的鷹犬罷了。說得光大一點，我頂多只當了一個四川境內的如蛆如蠅的軍閥。所以自己的落伍雖然不是甚麼光榮的事情，然而也不是怎樣的恥辱。

保路同志軍雖然是四川獨立的元勳，但他們依然是封建社會裏面的骨董，他們不過是被有產者利用來做了爭路的手段罷了。他們當然沒有收拾四川的能力，然而根本也沒有人期待他們來收拾四川，演傀儡劇的人在把戲錢騙到了手之後，傀儡依然是要檢放在破箱子裏面的。

(7)

舞台大轉換，新的登台人物是尹昌衡董脩武楊莘友諸人。

尹昌衡是武備學堂的第一批畢業生，又進過日本的士官學校，在這兒和蔡鐸好像是同學，他們後來同回國，也同在廣西的講武堂幹過事情。他是由趙爾巽手裏調回四川來辦督練公所的。這位先生人很魁梧，在武人裏面也比較還有點天分，他能夠熬幾句章太炎式的似通非通的古文，似選非選的古詩。他不是立憲派，也不是革命黨，他只是有

兵權在手裏的實力派。自從滿清末年以來高呼着的“富國強兵”的口號總算是發生了效力：因為凡有國者必富而有兵者必強，這自辛亥革命以來一直到現在可以說已經成了鐵則。甚麼主義義主都是騙人的話，只要你手裏有兵。你手裏一有兵，不怕你昨天還是萬惡的軍閥，今天便可以成爲忠實的信徒；你昨天還是一個流氓，今天便可以成爲一個名實相符的皇帝。尹昌衡在四川算首先開了這個創例了。

他那時是任陸軍小學校的校長，這陸軍學校本身已經便是他的爪牙，同時因爲他又是陸軍的先輩，所以四川的軍界大都很願意受他的指揮。在趙爾豐未交出政權的時候已經造出了很多的謠言，說尹昌衡要帶領陸軍小學的生徒和鳳凰山的新軍攻打總督府，我們對於他也朝夕是希望着的，然而謠言終竟只成爲了謠言而消散了。

自羅蒲登基以後，一方面是羅蒲輩有意把持，另一方面也是反羅蒲輩的有意不合作，在暗中爭鬥了十天結果也就讓成了一場兵變。

羅蒲倒了。羅蒲之倒自然是給與董楊輩的革命黨人以佔領政權的機會，然而同時也給與他們一個很良好的教訓：便是沒有兵權不能固定自己的政權。在這兒革命黨人自然便和實力派苟合起來了，是在兵變後的第幾天我不記得，我們的奉天承運的尹大皇帝又在我們四川的七千萬的子民的擁戴之下誕登大寶了。

尹昌衡擔任都督，董脩武擔任財政部長，實際上也就是內閣總理大臣或者宰相，楊莘友是擔任的軍事巡警總監。在這兒我們的大哥也有一份，他擔任了交通部長。其他還有多少部我不甚記憶，部長是些甚麼人也不甚記憶了。總之代表人物是尹董楊，其他也不過和我們的大哥一樣，伴食大臣而

已。

我們的大哥，他和尹昌衡一樣，不是立憲派，不是革命黨人，但也不是實力派。他的資格是東文學堂出身，是留學過東洋回來的，這第二批的新政府東洋幫最佔勢力，特別是東文幫，所有各部的部長副部長差不多是被他們包辦了的。大哥在東文幫裏面算得是水面上的人物，所以部長的椅子也就有了他的一份了。

新人一上台委實又有一番新的氣象。都督是名實相符的軍事家，四川立地便成立了四師新軍（這在目前連四十師都有的四川當然不算多，然在當時的確是有點孫悟空吹毫毛的戲法一樣）。董先生的最高妙的財政政策便是多發紙幣多鑄銅元。紙幣不限於一元以上的銀貨的代用，就是由十枚二十枚五十枚至一百枚的銅元代用券也應有的盡有了，有的是皮筋紙，那怕你有甚麼不能解決

的財政上的困難。銅元同樣的由十文二十文五十文一百文乃至五百文的都有。那當五百的大銅元，我想來怕是外省所少見的，那與其說是銅元寧可說是“銅鏡”。但這種銅鏡，在後來又有分用的辦法，一個銅元把它分成四個，每個又當一百使用。——四川的一部幣政史假如有人肯把它纂集起來，那真可以抵當得過五百部的滑稽小說。

董脩武的德政，當然不是他一上台就造成了的，這兒所敘述的是綜合着後來的好幾年的歷史。不過這位董脩武先生他總還算是“行己有恥”的人，他後來（彷彿是民國三年的初間）終因為財政的問題下了獄，而他自己在獄中毒死了的。

過細的評判起來，董脩武先生確要算是時代的犧牲者。中國人在夢裏寐裏時常所想念着的便是要富國強兵，結果是國雖然沒有富而兵倒強了起來。兵數一天一天的增加，在有限的收入裏要

橫添出無數的軍費，你教人怎樣能不濫發紙幣？發紙幣的政策本來並不是甚麼惡劣的政策，只要你有相當的信用，相當的基金。但是在中國的國度裏你那裏去找那種基金來？中國的紙幣大都是沒有相當的基金，也就給整個的中國不能富的原因是一樣，是由於帝國主義者的縛束，帝國主義者的榨取。董先生要算是死在這個吃人不流血的怪物的虎口裏了。

這些都是後事，總之在這一批新上台的脚色，多少總還有了一番作爲，儘管後來的流弊是怎麼樣，多少總算是把那目前的緊急問題解救了。特別是那位擔任軍事巡警的楊總監，他真有點雷厲風行的手腕。他的軍事巡警是要背馬槍的，這比從前拿着一根哭喪棍的警丁大有威武了。然而那馬槍對於當時的江湖派却是無上的誘惑。政府儘管成立了，然而他們的公堂在初期依然存在，他們從

那變兵身上搶槍的滋味是一時不會容易忘記的，這軍事巡警不消說是他們的敵人，於是乎他們也就從他們的身上來搶他們的馬槍。弄到後來巡警站崗是兩個人或三個人背靠背的站着，手裏揣着上了彈的馬槍，就這樣終竟也把那一時的無政府狀態彈壓下來了。

這從有產者的立場上來說總要算是他們的功德，他們彈壓民衆的手段雖然比趙爾豐周孝懷還要厲害，然而却是聲望日隆，他們在成都人的眼中就好像劉關張的再世一樣。

那位二十世紀的劉玄德的確也有點劉玄德的精神。不是別的，就是因為他的老婆很多。他在未和自己的聘妻結婚以前，便先討了六七位小老婆，而這六七位小老婆大都是在他當了都督之後收集起來的。他人很年青，在當時怕僅僅三十來往歲，人又魁梧，面孔也還漂亮，地位又是一省的都

督。他偶爾肯從都督府裏出來巡街，在他出府的時候那真是威風。他自己是有一匹很高大的黑色的洋馬的，他便騎在馬上，前後總有十幾匹馬隊簇擁着他，而他們在街上總是放着小跑。在這時候街上的人不消說都要邊讓，兩街坊的人家，特別是平常不大出門的女眷，便大都爭到街口來瞻仰這位天上下來的將軍。

女眷們心曠目眩的在瞻仰將軍，將軍在電掣風馳中其實也就在物色他的妃嬪。他的一些愛妾大概就是在這樣的機會中挑選出來的了。

成都人有一句意義轉變的說話，便是“願盡義務”。這“願盡義務”四個字，你到了成都是不好隨意說出口的。聽說有一次也是都督出府。在都督府的皇城附近有一家成衣店，那成衣店的老板娘很有姿色。在都督從她店舖門口跑過的時候，她滿看了都督一場，却誰知都督也把她飽看在心裏了。

在都督回府之後，就在那天晚上，都督派了副官來和成衣店的老板交涉，說都督看中了那老板娘，要請她進宮。你說，那老板是怎樣的答覆？他很鞠躬盡瘁的回答道：

“既是都督有心，小民願盡義務。”

就這樣這“願盡義務”便成爲了成都人的話柄。這位尹將軍的猖狂真也就不可一世了，然而他的“寡人好色”的表現還不僅這一點。

成都有一位有名的旦脚名叫楊素蘭，這在二三十年前要算是四川的梅蘭芳，而他的勢力或許還在梅蘭芳之上。他這人可以說是一個人妖，用藝術家的誇大語來說，或者就是一位天才。總之他是多年的楊素蘭了，在我們在成都看見他唱戲的時候，怕已經有五十多歲，然而他還是在唱閩門旦（花衫）。他在年青的時候有一位總督很喜歡他，他時常是出入公門，在那時總督以下的司道府縣的大

小候補官員沒有一個不去仰仰他的鼻息的。

尹都督却也看上了這位老天才，他真異想天開，公然叫他裝扮成女眷進他的都督府去。

有一天晚上却是天才的不幸，在他進都督府門的時候却闖着了那位號稱張三爺的楊總監，公然把他破獲了。這件事情便鬧遍了全城，弄到第二天我們的尹大都督便下了一通罪已詔，深深的把楊總監褒獎了一場，好像是稱他為“鐵面御史”。

中國的社會實在是一種怪異。像尹大都督的這些行爲，在我們敘述起來好像是怎麼也不敢恭維的一樣，然而在中國的社會裏面却不是那樣一回事。三妻二妾的教條是幾千年來的聖賢的禮法，所以愈見是大人大物他的妻妾便愈見多。當事者自以為矜榮，而旁觀者亦不勝其欽羨。就像尹大都督這一個例子，他自己是絲毫沒有甚麼內咎的，否，不僅沒有內咎他還自己誇獎過自己。有一次我

聽見過他在青年會演說，他的題目是“英雄與好色”。他的演說我並沒有聽完，只是有一個很有趣的三段論法却永遠留在了我的腦中。他說：

“自古英雄多好色……………（大前提）

昌衡好色……………（小前提）

所以昌衡是英雄。……………”（判斷）

我不是要來講邏輯的，他這個三段論法究竟犯了邏輯上的那一種錯誤，我現在不管。總之你可以看見他是怎樣的在陶醉在他的自我裏面了！他自視他的行徑是英雄，所以我在這兒把他的佳話記述了一些出來，我也不是在揭發甚麼人的陰私，我是在描寫一位“英雄”呢。

尹大都督他到底不愧是一位英雄，他把那位以殺人有名而綽號屠戶的趙爾豐終竟屠殺了。

那已經是快到陰曆年底了，趙爾豐依然還是住在總督署裏面。

外邊對於他造了不少的謠言，說總督署裏面藏了好多兵，又有好幾架機關槍陳列在大堂上的，想乘着機會攻打出來。新政府屢次要想解決他，也就因為有這樣的風聞，終不敢輕易動手。

快要到陰曆的年底了，尹大都督或許也怕是想立出一項功業來挽回他的名譽罷？他終竟派了三營人把舊總督府包圍了起來。裏面並沒有甚麼動靜，他們也就攻打進去。衙門裏面那裏有甚麼兵？大堂上面那裏有甚麼機關槍呢？比諸葛亮的“空城計”還要空得厲害的，是老卒殘兵的影子都不見一個。

一直走進裏面去搜查的是一位營長。他最後終竟搜到了趙爾豐的寢室，他闖進門去，裏面打了一發手槍出來。

趙爾豐病了，是睡在床上的，只留着一位“蠻了頭”（四川人是這樣的稱呼，是否蠻子我不知道）

在服侍他的湯藥。那打手槍的便是這位蠻了頭了。

一位病夫，一位女子，當然只好束手被擒。蠻了頭好像當場便被槍決了，趙爾豐便從病床上拉了下來，由督署街拉到皇城，他的腦袋子也就和端方的一樣被指揮刀斫了下來。

趙爾豐假使不病，或者他早已設法逃避了罷？他病了，全無抵抗地遭了別人的屠殺，儘管他在生時人人以“屠戶”目之，然而待他一死，大家對他却隱隱有些惋惜起來。他在經營西藏上，大約很受了一番辛苦，他年紀僅僅五十上下，聽說頭髮都已經全白了。特別令人惋惜的是他的蠻了頭，四川人差不多沒有人不稱道她的。她這位異民族的女性為中國的封建勢力的末路，也點綴一段優美的光輝。古代的所謂“忠義”，結晶在這位女性身上了。

趙爾豐死後還有小小的一場波折。

尹大都督一把他的頭首斫了下來，真好像他

親手斫下了一匹老虎的頭首一樣，他自己把來提在手裏從都督府打馬出來，遊街示衆。

待他跑到東大街，從一家店舖的樓上“搭”的一聲打了一槍手槍下來，打中了他背後的一位馬弁。大都督回馬便跑，提着人頭又跑回都督府裏去了。

放槍的人也被擒獲着了，是趙爾豐的一位師爺，好像姓傅，名字我已經忘了。他是跟着趙爾豐一同進藏的，他有一部很詳細的“西康省計畫書”，我曾經看過。

這位傅先生，以封建社會的道德來說，倒真不媿是一位英雄，他和那“蠻子頭”兩人，真可以說是足以對得着自己的知己。但他是沒有死的。他被尹大都督的部下擒獲了之後，他要求尹大都督殺他；但在這兒却實現了“英雄惜英雄，猩猩惜猩猩”的古話，我們的尹大都督不也是一位大英雄嗎？所以

他反以上賓之禮待之，他稱他爲“國士”。他這人是外省人，不久便離開四川去了，後來的消息我便全不知道。

一九二九年八月十五日出版

版權所有

3.00

甲種每冊實價大 ~~3.00~~

乙種每冊實價大 ~~2.00~~

上海四馬路現代書局發行

定價
卷
十
元

10/10/10